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全球對話 10.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 Robert Kuttner 談社會學

Johanna Grubner

氣候與變遷

Md. Rezwan Siddiqui Markus Wissen Vishwas Satgar Joan Fitzgerald

COVID-19: 大流行與危機 Mahmudul Hasan Laskar Attila Melegh Iliana Olivié, Manuel Gracia Brigitte Aulenbacher, Petra Ezzeddine, Dóra Gábriel, Michael Leiblfinger, Kinga Milankovics, Veronika Prieler Dev Nath Pathak Michele Grigolo, Craig Lundy

理論觀點

Syed Farid Alatas

悼念 Yogendra Singh

Mir Suheel Rasool

重新想像社會

S.A. Hamed Hosseini Barry Gills Scott Timcke Shelene Gomes

斯里蘭卡的 社會學 Siri Hettige Subhangi M.K. Herath Kalinga Tudor Silva Farzana Haniffa Premakumara de Silva

議題開講

> 中國塑膠廢棄物議題

第10卷 /第3期 / 2020.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主編的話

期「社會學對話」專訪知名記者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他在著作中將卡爾·波蘭尼(KarlPolanyi)作品與當今社會發展對話。由二十世紀初的政經局勢出發,訪談討論全球化當前的趨勢、探討強大的國家經濟以強化民主決策的需求,以及包容或反對國際移民增加的問題。

我們第一個專題將探討這個時代最迫切的問題:氣候變遷。一方面,文章暫時不先直接回應生態議題,而是先探討氣候變遷對社會的影響(如民主或移民問題)。另一方面,本章節的重點貢獻是針對資本主義帶來的環境破壞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

正如我們撰寫的,COVID-19疫情與其影響仍以不同方式主宰著世界多數地區。正因如此,我們增加收錄有關COVID-19章節,以收集來自全球的分析資料。包括印度與歐洲在居家隔離期間,從居家照護、慈善體系與移民制度,到公共社會學的可能性等主題,本節將帶我們一窺這些領域當前的討論。

COVID-19的危機也是Syed Farid Alatas對社會學思潮與理論在整體社會中產生作用與影響,並進行深刻反思的起點。

本期雜誌向今年剛去世的印度社會學先驅 Yogendra Singh致敬,他對印度傳統和現代化的後 殖民研究都具開創性。

有三項貢獻旨在重新想像社會,並反思當前的發展與社會學的重要性。S.A. Hamed Hosseini 與Barry Gills 提出一種顛覆性的觀點,而Shelene Gomes 與 Scott Timcke 則探討要怎樣由社會學的角度探討社會。

這一期的區域焦點著重在斯里蘭卡的社會學研究。本章節由Siri Hettige共同編撰,著重在介紹該國充滿活力的學科,從對斯里蘭卡暴力衝突的分析,到關於團結的問題,本章提供對該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的歷史的深刻見解。

最後,「議題開講」重回全球化與生態災難議題, 探討在中國的塑膠垃圾危機。■

>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ISA website.
- >投稿來信寄給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GLOBAL DIALOGUE



>編輯團隊

主編: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 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 (突尼西亞)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阿爾及利亞)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摩洛哥)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黎巴嫩) Sari Hanaf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Faezeh Khajehzade.

哈薩克: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蘭: Beata Maluchnik, Justyna Kościńska, Jonathan Scovil, Sara Herczyńska, Weronika Peek, Kamil Lipiński, Aleksandra Wag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żijew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Bianca Mihăilă, Alexandra Mosor, Maria Stoicescu.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臺灣:李宛儒,林玟圻,呂道詠,洪柏勝,陳昱嘉,黃昱閔.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本次專題介紹了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氣候變遷,我們討論其對社會的影響,這些影響並不常備與與生態問題連結,比如民主和移民問題,但也勾勒出避免資本主義進一步破壞環境的可能替代方案。



全球對話繼續就不同國家因新冠肺炎而面臨的當前形勢和危機開展討論。印度和歐洲的學者,對於住家照顧、慈善、移民、封鎖期間公共社會學的可能性等議題有諸多敘述,這個特殊專題提供我們的學科中對於當前議題的討論概覽。



本節著重於斯里蘭卡的社會學,強調該國充滿活力的學科,從暴力衝突問題到斯里蘭卡的團結問題。該部分也讓我們深入理解 這個國家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理論觀點	
		社交隔離:社會學的視角	
>社會學對話		Syed Farid Alatas, 新加坡	
跟著卡爾·波蘭尼一起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求生存:			
Robert Kuttner 專訪		> <mark>悼念</mark>	
Johanna Grubner, 澳洲	5	Yogendra Singh:現代印度社會學的先驅	
		Mir Suheel Rasool, 印度	32
> 氣候與變遷			
南亞的氣候移民		> 重新想像社會	
Md. Rezwan Siddiqui, 孟加拉	8	論重新整合基進觀點的急迫性	
氣候危機與對民主的質疑		S.A. Hamed Hosseini, 澳大利亞	
Markus Wissen, 德國	10	「Koyaanisqatsi」之後:文明的再想像	
資本主義的下一步: 民主生態社會主義?		Barry Gills, 芬蘭	
Vishwas Satgar, 南非	12		
都市的氣候行動如何重建社區		拉斯塔法里運動及西印度的再發明	
Joan Fitzgerald, 美國	14	Scott Timcke 與 Shelene Gomes, 千里達及托巴哥	
> COVID-19: 大流行與危機		> 斯里蘭卡的社會學	
行善背後的階級與污名:印度的封城		全球和在地脈絡下的斯里蘭卡社會學	
Mahmudul Hasan Laskar, 印度	16	Siri Hettige, 斯里蘭卡	
照護的稀少性?照護移民與政治人口學		斯里蘭卡社會學一回顧既往	
Attila Melegh, 匈牙利	18	Subhangi M.K. Herath, 斯里蘭卡	
COVID-19能終結全球化現象嗎?			
Iliana Olivié 與 Manuel Gracia, 西班牙	20	Kalinga Tudor Silva, 斯里蘭卡	
面對COVID-19:中歐的居家照護		暴力分析:斯里蘭卡的國家構成	
Brigitte Aulenbacher, 奥地利; Petra Ezzeddine, 捷克		Farzana Haniffa, 斯里蘭卡 4	
Dóra Gábriel, 匈牙利; Michael Leiblfinger, 奧地利;		微微之界:	
Kinga Milankovics, 匈牙利; Veronika Prieler, 奧地利	23	斯里蘭卡的社會學與人類學	
南亞封鎖期間的公共社會學		Premakumara de Silva, 斯里蘭卡	48
Dev Nath Pathak, 印度	25		
直面疫情的公共社會學		>議題開講	
Michele Grigolo與 Craig Lundy, 英國	27	全球化與依賴性:	
		中國塑膠廢棄物議題	
		Pinar Temocin, 日本	50

「2020年代被認為是人類史上最至關重要的世紀中最關鍵的十年,其中 『尋求不可能』成為新興革命力量的唯一『現實』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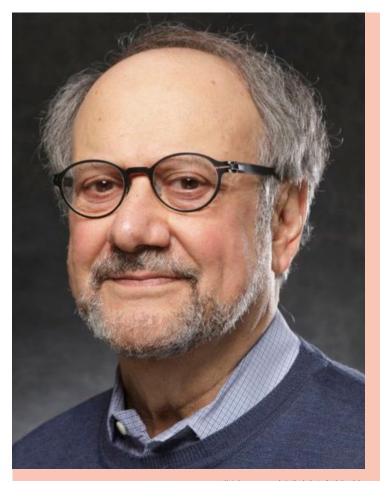
S.A. Hamed Hosseini

>跟著卡爾·波蘭尼

一起在全球資本主義下

求生存:

Robert Kuttner 專訪



Robert Kuttner 是《美國展堂》雜誌的共同創辦人與編輯,以及布蘭代斯大學海勒社會政策與管理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創始人之一,現任職於該研究所的董事會和執行委員會。Kuttner 一共出版了12本書,例如最近的《民主能否倖免於全球資本主義?》和談及民主與2020年大選的《存亡之際(The Stakes:

Robert Kuttner。來源: Robert Kuttner。

2020 and the Survival of American Democracy)》,其他著作還有2008年的紐 約時報暢銷書《歐巴馬的挑戰:美國經濟危 機與改革總統的權力》、2013年關於金融危 機的著作《債務人的監獄:經濟緊縮與機率 的政治》等;其中《一切皆可賣:市場機制的 優勢與侷限》(1997)是他最為著名的早期 著作。他的文章曾刊於《紐約時報書評》、《 大西洋》、《哈潑雜誌》、《新共和周刊》、《紐 約書評》、《紐約人》、《紐約雜誌》、《瓊斯媽 媽》、《鄉村之聲(Village Voice)》、《公益(Commonweal)》、《異議雜誌(Dissent)》、 《外交》、《新政治家》、《政治科學季刊》、《 哥倫比亞新聞評論》、《哈佛商業評論》和《 挑戰(Challenge)》等雜誌上,主題涵蓋經 濟與政治的互動。此外, Kuttner 也曾擔任 《華盛頓郵報》的國家撰寫人與專欄作家、 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首席調查員、卡特 總統的社區國家委員會執行主任、《新共 和》的經濟學編輯。

他更獲得許多獎項,例如因畢生致力於經濟效益和社會正義議題,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頒發的保羅·霍夫曼獎(Paul Hoffman Award)。此次訪談由Johanna Grubner擔任訪員,他是奧地利約翰·克卜勒林茲大學的博士研究員,也是《全球對話》的助理編輯。

JG:你在2018年發表的著作《民主能否倖免於全球資本主義?》裡,你提到了卡爾·波蘭尼對二十世紀初的分析,指出我們如今,不管在經濟或是政治上,都面臨了類似的情境。可以請你為我們的讀者解釋這個論點,說明波蘭尼的觀點如何在你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分析中發揮作用嗎?

RK:在二十世紀初期,財富菁英和其政治盟友,默許資本主義凌駕於其他社會韌性(social resilience)的機制之上。《凡爾賽條約》更是加劇了這樣的情況,將自由放任、債權集中的概念和經濟緊縮政策結合,導致當時一般大眾的生活在經濟上變得困難;特別是在德國和奧地利,大量民眾轉向了法西斯主義。他們會這麼做,除了是對議會制度失去了信心,也是因為極端的經濟型態和政治民族主義似乎能帶來更好的出路。

在波蘭尼的描述裡,十九世紀經濟體系由三個機制構成:黃金本位、自由貿易,以及勞動力必須以商品形式在市場上產生價值的觀點。這和現在的情況如出一徹:黃金本位中的預算平衡與緊縮政策、世界貿易組織和新自由主義,使不受監管的全球商業擴張加劇、對勞工的保障也在自由貿易的名義下消滅殆盡。自由放任的政策再次為民眾招來經濟災難,其在政治上的反彈力量,更形成極端民族主義。.

更恐怖的是,我們可以從戰後的這段時期知道,雖然從經濟學的角度而言,社會保障機制可以讓資本主義的體系更具生產力、更加公正,並藉此緩解純資本主義的發展;然而自1973年以來,我們可以發現,這樣的平衡在政治上是難以維持的。資本家不喜歡、並抗拒這些約束。

這樣做的後果,在1920及1930年代也是一樣的。勞工受到不合理的對待時,政治中心並沒有站在他們那邊,而是轉向了極右派。在1990年代,許多人變得傾向左派,但是1990年代傾向左派的人,也已經接收了大部分的新自由主義價值。

如今,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由一位 新法西斯主義者所領導;舊歐洲、新歐洲都有新法 西斯主義者,能被信賴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已很稀 少。前面說的這些,都非常的波蘭尼。

JG:雖然您提到了這幾個比較明顯的相似之處,但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capitalist production)與1930年代的全球經濟有所不同,例如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是以「即時生產制」的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s)為建立

基礎的;這難道不會導致不同的後果嗎?波蘭尼的分析為何在這種情況下還是那麼有效呢?

RK:現代經濟往全球供應鏈模式轉向,使得波蘭尼的觀點比起過去的任何時刻都更重要。由於在亞洲受到剝削的勞工薪資較低,大型企業開始把業務外包到亞洲,也連帶讓民主制度中的社會契約難以維繫、勞工在面對變化無常的市場時不受保護。全球供應鏈現在就像是打了類固醇的自由市場。

JG:在美國、拉丁美洲和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正在崛起。你會如何看待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政府管制的削弱,以及在歐洲、美國、拉丁美洲等地的右翼民粹主義和你之前提及的新法西斯主義崛起之間的關係?

RK:問題並不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本身。在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體系之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目的,是要給予國家足夠的政治、政策空間,來創造完全就業的經濟,並以此保護其不受全球私有資本的通貨緊縮威脅。然而,自世界貿易組織創立、歐洲的馬斯垂克條約實施以來,全球化卻明顯變成是利用商品、服務、資本的自由流動法則,來削弱民主政治約束與緩解資本的能力;在歐洲,這樣的情況則是透過人的自由流動發生。也因此,受到錯誤對待的人民只好轉向極端國族主義者、右翼民粹主義者,玻利維亞的人民則轉向了左翼民粹主義。

JG:過去反抗資本主義不平等的社會運動,都會希望能從國際層次出發,來進行相關論述;然而現在的社會運動,多以國家層次來看待資本主義的問題。你覺得這樣的社會運動,有怎樣的發展空間,和前述的議題又有何關聯?民族國家策略帶來的優勢,對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會是最好的選擇嗎?

RK:就像我說的,民族國家是政體與民主公民的核心。然而,從布列敦森林體系、國際勞工組織條約中,我們可以發現,國際公民與勞工的團結扮演著制衡國際資本的重要角色。問題是,布列敦森林體系時期只是個例外。大部分情況下,國際主義已經變成了資本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公民的國際主義。

JG:在你的著作裡面,你提到了「混合經濟體」如何 為戰後的美國和歐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 可以請你為我們解釋一下何謂「混合經濟」,這和民 主與國家的自治權又有什麼關聯?

RK:經濟學家Paul Samuelson以混合經濟一詞指稱某種特定的資本主義經濟,其會視情況以福利國家、公共計畫、財產共有等制度為輔助,有時還會針

對經濟部門和其他產業進行嚴格的管制。混合經濟也會透過管制農業、賦予工會權力使其成為合法的社會夥伴(social partner),或是透過其他的政府功能,來限縮純資本主義的發展空間。由於公民權是從民族國家的意義上形成,這些政策大部分也是以國家為執行單位。簡單來說,歐洲各國組成歐盟導致對資本主義的管控逐漸減弱,甚至加強了資本的力量。海耶克早已預示了這樣的情況,也樂於見到此種情景。對波蘭尼來說,不管在經濟還是政治上,混合經濟都不是最好的解方。真正有效的,是民主社會主義。

JG:「獨立國家裡的民主社會主義,要如何在全球 化資本主義下生存並作出反抗?」許多國家的左派 仍然面臨這樣的問題。對於此種困境,波蘭尼有什 麼見解嗎?

RK: 這需要透過大國的左翼政府, 或是針對全球 金融力量進行限制才能解決。雖然備受波蘭尼推 崇的紅色維也納不過維持了十五年左右,就被更 強大的勢力摧毀;但至少在二戰後的這二三十年 間,我們經歷了一些類似於社會民主的事物,即便 那並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在瑞典,這樣的狀態甚至 持續得更久。所以說如果公民成功地被動員起來, 這個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至少可以維持一到兩個 世代。就像凱因斯說的:長遠來看,我們都已經死了 (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不過,如果 全球化體系這麼排斥國家內部的社會民主,那就 連瑞典或是丹麥如此完善的共識體系都可能面臨 風險。在全球化主義之下,社會福利和合宜的工資 反而被認為不具競爭力,國內的管制也受到消減。 作為歐洲大陸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代表,歐洲法 院更是指出斯堪地那維亞的社會契約在許多層面 與歐盟的基本法不相容。自從新自由主義者在斯 德哥爾摩和哥本哈根掌握了權力,他們就開始蓄 意地從制度上破壞社會團結(social solidarity)。 由此來看,我們不僅需要修正全球化體系,也要一 步步地重建各國的國內政治,兩者缺一不可。

JG:你提到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下,強大的國家經濟會是維持民主制度的一個有利因素。對你來說, 在加強政府權力,以及以公民權為名義維繫的全球不平等這兩件事之間的協調上,有什麼是必要的?

RK:我認為一個公平的經濟形式一定要由國家主導,因為民主制度中的公民權利也是由國家而生的。然而富裕國家的公民消耗了世界上極大比例的資源,他們必須為保護環境永續與全球經濟公平性出一份力。自由放任雖然是一種平衡全球收

入的方式,卻也造成國家內部的政治與經濟不平等,間接導致了民主的衰弱,對於氣候災害的問題更是束手無策。就如Nicholas Stern認為的,全球氣候變遷是歷史上最龐大的市場崩壞案例。我們應該藉由限制,而不是開放自由放任的政策,來達成氣候正義與全球平等。

JG:在這個受移民與逃難影響甚深的時代,「公民身分的概念必然伴隨著不平等」的論述是飽受爭議的。你會如何評論這種應該將民主權利與公民權脫鉤的觀點?

RK: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會帶來有關成員身份的議題。民主政體的成員被稱作公民。即使是不具有投票權的「非公民」,足夠完善的民主也應當賦予他們基本權利。這些非公民卻被當成是外來者——而沒有人應該被排除在基本人權之外。這便是那些人權基本條約和公約被建立的目的。像是斯堪地那維亞這類相對健全的民主國家,通常也傾向支持不具有國家公民身份的人,使其享有普世價值下的基本權利。

不過,這些基本條約與公約的實際效用,仍需以簽署國家的接受與執行為前提。1951年,由145個國家簽署批準的《難民公約(Convention on Refugees)》,就規定各國必須庇護那些有明確受迫害可能的難民。這項公約也賦予難民訴諸法庭的權利。然而,由於對於逃難者與移民的敵視,國家無視了公約的內涵與規範,擅自將經濟難民和政治難民作出區隔,使得尋求庇護的人們陷入困境。同樣的規避手段,也會在各國面對國際勞工組織訂定的條約時被使用。

JG:COVID-19的疫情及其帶來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似乎在許多國家成為了一種持續性的危機。在你的觀點中,這對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關係又帶來了什麼危機?

RK:疫情反映出我們急需有效的治理,也顯示私有市場在處理公共衛生議題上的弱勢。疫苗和檢測制度都是社會產品。由有效政府領導的國家,通過和世界衛生組織與民間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在控制病毒擴散上也做得較好。必須注意的是,這些行動是以政府為主導者。川普如果是個盡職的新法西斯主義者,就應該作為一位有野心的獨裁者,展現其處事效力。事實證明,川普既無能又腐敗,也顯示了政府不能只是強大,更要展現其高效性,以及為民主負責的心態。

來信寄至

Robert Kuttner kuttner@prospect.org

> 南亞的氣候移民

Md. Rezwan Siddiqui,東西大學,孟加拉



在蒙古,一種被稱為「dzud」的氣候現象越來 越頻繁地出現,這種現象描述的是極端的冬 季。特別是在與非常乾燥的夏季相結合的情 況下,它會導致大量的牲畜死亡,而這些牲 畜是人口賴以為生的。

來源: Asian Development Bank/flickr. com. 保留部分權利。

亞(由阿富汗、孟加拉國,不丹、巴基斯坦、尼泊爾,馬爾地夫、印度和斯里蘭卡組成),估計人口為18億3600萬人(幾乎佔了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之一。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人類發展指數不斷提升以及快速地都市化之下,南亞已成為全球發展的前線。.

移民一直是南亞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而經濟成長的不平衡無疑是促使南亞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但是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在許多關於史前人類活動的討論中,已經有證據顯示人們傾向於暫時性/季節性/永久性地遷移,以減少自然災害和農業危機帶來的風險。在南亞,人口流動行為的主要類型是內部遷移(主要是由農村到城市)。國際上的人口流動也很常見,尤其是在這近幾十年中,該地區每年的移民外流(主要是經濟/勞工移民)都在大幅增長。由於南亞的國家之間共享悠久的歷史、相似的社會文化及經濟生活方式,加上邊界的鬆懈管制,導致南亞國家之間的人口的跨國流動現象也相當地頻繁。

實際上,南亞在氣候變遷上的脆弱性 大多不是因生物物理脆弱性(biophysical vulnerability),如氣候參數的變化和由此而 生的極端天氣所引起;而是由社會經濟脆弱性(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所引起,這包含了社會中惡劣的社會經濟條件、高貧窮率、對農業的高度依賴、基礎設施不足、治理薄弱等。根據《2020年國內流離失所問題的全球報告》(Global Report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 2020),2019年在南亞約有950萬人因自然災害(如:洪水、季風雨和氣旋)而流離失所。目前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氣候變遷加劇了這些危害的強度、頻率和影響程度。根據世界銀行指出,視這一問題的解決程度而定,在2050年前可能還會多出1800萬到4000萬位氣候移民。

南亞氣候變遷的遷移具有一些獨特的特徵。 首先,雖然氣候變遷不是影響南亞人口遷移的主 要原因,但與其他社會經濟脆弱性相互作用後會 大大加劇遷移的風險。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經 濟景氣在氣候變遷擾亂社會和生計安全之下受 到影響。除此之外,氣候變遷已直接影響了生態 系服務(ecosystem services)、糧食安全、人類 健康,還有南亞的農業能力和生計。

其次,我們需要了解,南亞的大多數內部遷 移都是基於經濟因素。相對之下,大部分跨國和 國際遷移都是政治和經濟因素混合下的結果。不



在亞洲,颱風的發生非常頻繁,對人們的生 存帶來許多威脅。

來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flickr. com. 保留部分權利。

論是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氣候變遷正加劇了這些因素的影響。

第三,在大多數情況下,將氣候移民與其他種類的移民區分開來並不容易,就算盡了一切努力,卻仍是徒勞無功!南亞各地存在著各式各樣的人口流動行為,不論個人或是社區都會採取這些行動,盡可能地減少氣候變遷(和其他威脅)對其生活及生計造成影響。而這樣多樣化的人口流動行為,我們實在無法將它們全部整合到同一個框架中。因此,建立一個與經濟、政治移民相聯結的氣候移民框架,並研究氣候變遷對(任何)人口流動行為造成的直接或間接影響可能更有用。

第四,有關氣候變遷與移民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的數據在南亞難以取得,無可避免地使當局無力制訂相關策略和管理移民。此外,氣候變遷與其他移民因素(政治、經濟或社會)之間,特別是在微觀尺度上的作用關係都仍尚未了解清楚。

第五,在南亞,氣候變遷是造成內部遷移的顯著因素。這種遷移通常一開始是暫時或季節性的人口流動,但隨後就變成了永久遷移。在這之中,移民大多會前往都會地區,且遵循移民網絡和逐步遷徙(step-migration)的模式。

第六,跨國氣候遷移已是該地區的爭議性問題。這些國家、政府對於問題的性質、模式和未來上並沒有一致的共識。在議題進一步複雜化之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問題已成為該地區高度政治化的議題,也同時變成了在安全上被過度炒作的關注重點。

第七,該地區的國家是許多已開發國家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而其大部分是通過雙邊協議(bilateral agreements)來進行管理。不幸的是,這些國家在這一勞動力產業存在著激烈的競爭。有時,這些勞務遷移會被吹捧為氣候移民的適應過程之一,但事實幾乎並非如此。

第八,人口流動(或不流動)選擇下的結果,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移民者的能力以及他們移民 的社會。就目前的觀察而言,社會中(特別是城 市)對於收容氣候移民的能力並沒有明顯提升, 環境移民或氣候移民仍被迫在社會邊緣中生存。 第九,南亞國家的移民政策體制主要在阻止由 氣候變遷引起的人口流動,這樣做的目的是為 了管理都會地區本已受到限縮的資源和服務。 當局並不會花太多精力去提升這些移民者的個 人能力、幫助他們適應移民的過程。最近,印度 和孟加拉國已採取行動,將次級城市發展為移 民友善的地方。然而,這些措施由於無法解決社 會正義的問題,以及缺乏以人為本的發展計劃, 常常被認為是無用的政策。此外,傳統的精英利 益壟斷和普遍的腐敗也阻礙著這些計畫取得成 功。

不幸的是,在這些問題的管理上,南亞國家之間幾乎沒有什麼合作成果。付出的努力大多侷限於學術和研究領域,並未反映在發展計劃中;而以全面的全國人口普查解決資料稀少的行動也不夠充分。如果沒有花費心力去理解氣候移民的身份、透過國家及區域政策解決事情,面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希望。■

來信寄至:

Md. Rezwan Siddiqui <rezsid@ewubd.edu>

> 氣候危機 與對民主的質疑

Markus Wissen, 柏林經濟與法律應用科學大學, 德國

果我們思考氣候危機、氣候政策和自 由民主等議題,首先要提到的是一種 引人注目的緊張局勢:在自由民主的 條件下,就算是以有效的氣候政策應對氣候危 機,似乎也非常困難。近幾十年來,大多數自由 民主國家已就一些國際條約達成共識,但這些 政策和條約,卻帶來許多負面影響。1997年的《 京都議定書》對於抑制全球碳排放量上升並沒 有幫助;而2015年的《巴黎氣候協定》中,許多締 約方無法明快地給予承諾、保證會付出更多努 力,這些都讓人難以相信未來還會有更有效的 氣候政策。此外,如果我們考慮到那些像中國一 樣的獨裁國家,雖然存在著持續性的環境問題、 高碳排放強度的發展模式,但又似乎能夠執行 重要的環境和再生能源計劃;這就帶出了一個 問題:自由民主制度是否可以應對人類最緊迫 的問題?

> 自由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 結構上的親近關係

在氣候危機、氣候政策和自由民主制度之間所存在的歷史與經驗上的緊張關係,其根源是個更為系統性的問題。民主的實質是平等,自由民主制度則為公民在政治意義上的平等提供基礎:選舉中,工人的一票與執行長的一票等值;而執行長作為合法公民,與工人相比並沒有任何特權。這毫無疑問地是一項歷史性成就。

但這只是事實的其中一面,由另一面來看,自由民主制度性地將社會權力中心與平等參與的機會區隔開來。企業家的決定屬於個人,只有他們決定之下的框架條件才會受到公共影響。除此之外的利益相關者,即受決策後果影響的所有人:工人、工廠附近的社區、廣大公眾,都沒有機會去平等地參與決策過程。

在這一點,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結構親和力(structural affinity)變得非常明顯。自由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維護了公民、政治權

利,以及私有財產;也保證了政治領域的平等, 同時對於基礎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又是保持中立。社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只有少數人 能掌握生產手段,而大多數人只能出售他們的 勞動力。

經濟外平等與經濟不平等之間的矛盾已是 長期的抗爭。過去,這些抗爭導致了全球北方自 由民主政體的幾次擴張:女性成功爭取到了選 舉權,也在國家中擔任社會再生產的有力角色; 環境運動也已成功限制有毒產品的生產,及可 能對環境有害的工業生產流程;移民為了擴 公民權而抗爭;工人運動的抗爭結果形成了工人 经受協的情況,而階級妥協基本上包含了工人 接受他們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底層角色, 以換取資本主義下所促成的財富增加。這就是 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立場:自由民主主義向福 利國家的方向擴展,並不挑戰資本主義社會中 的構成性不平等,但也有助於調節其矛盾。

>碳民主

從環境的角度來看,社會性增強的自由民主一直都是種碳民主(Timothy Mitchell)。而這個問題有兩種涵義:首先,在二十世紀中制度化的社會權利,並非工人在採礦業和採礦相關的基礎運輸設施中奮鬥的唯一結果;也就是說,其雖然造成了環境破壞,但對所有經濟和社會活動來說卻是必不可少,也因此工人被擺佈於重要的結構力量之上。其次,福利國家的再分配制度設計方式,取決於碳密集型經濟的增長。

這是作為資本主義政治形式的自由民主制與基礎環境的矛盾:在限縮最大化的經濟利益和調節基礎社會矛盾上,必然會產生社會生態成本,而現在這些成本將導致生存危機。如果無法認知到在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條件下,應對氣候危機的系統性限制,不管是再有效的氣候政策也注定會失敗。

「在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條件下,應對氣候危機的系統的效果有限。如果我們不承認這點,氣候政策就註定失敗。」

就算認知到前面這一點,也並不表示必須回 到獨裁體制的解決方案。儘管獨裁體制可能意 味著短期間內,某些環境措施的可執行性和加速 性,但它們仍然缺乏長期成功所需的反身性。

> 基進民主

反身性以審議為前提,而只有在民主的條件下才有可能進行審議。因此,應對氣候危機需要的是更多的民主,而自由民主必須超越其固有的局限性。自由民主目前所達到的成就受到右翼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 right)的強烈攻擊,必須將其轉變為基進民主(Radical democracy)來解決現況,這意味著所有受決策影響的人都有權利平等地參與決策過程;而反身性決策的可能性也將因此增加,因為做出決策的人同樣也是承擔決策後果的人。此外,基進民主也意味著建立一種積極制裁團結形式行為的制度和程序,從而促進民主學習和主體化的過程,這有助於克服效用最大化下的資本主義主體性。

我們可以將所謂的基礎經濟 (foundational economy)或基礎建設社會主 義(infrastructure socialism),作為思考基進 民主的切入點,從對社會和環境有益的生產及服 務的角度,重新思考並引導經濟。這包括:我們 所有人所仰賴的照護工作,以及維繫生活所需 要的健康、食品、交通、文化、通訊、水電等基礎 建設。將基礎建設置於公共控制之下的例子有不 少——這樣的模式在近幾十年來受到新自由主 義攻擊,在許多地方又因新冠肺炎的疫情而復 甦;勞動性別分工的問題也應受到同等關注。此 外,我們也應將基進民主擴展到其他仍由大型企 業主導的領域,但必須在民主的掌控之下,以防 止氣候危機加劇。■

体信寄至:

Markus Wissen <markus.wissen@hwr-berlin.de>

> 資本主義的下一步:

民主生態社會主義?

Vishwas Satgar, 金山大學, 南非, ISA 經濟與社會(RC02)、勞動運動(RC44)部門研究委員會會員



2019年11月29日周五·示威活動在南 非約翰內斯堡證券交易所外面舉行。 來源:Vishwas Satgar。

當代資本主義以碳為中心的生活世 , 界中, 耗油量大的汽車、高科技飛機、 ★大型貨櫃船和耗能的摩天大樓都是 大型的毀滅武器。這些資源密集和以碳為中心 的社會關係越是盛行,氣候變遷的速度就越快。 在地球生態系統破碎之後,這種新的資本主義 性質——在父權體制的馴化及科學的觀察和管 理下——現在必須進行地球工程的處理,將所排 放的碳儲存在地球的深處。儘管這會對地球上 的生命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但只有從這致命 資源中榨出最後一塊錢後,榨油的油栓才會關 上。當代資本主義的邏輯不僅關乎到掠奪,也與 生態謀殺(ecocide)相關。生態謀殺簡單來說, 就是消除掉維持地球上人類和非人生命所需的 條件。而這就是Karl Marx所說的「資本主義的 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 of capitalism),以 及Rosa Luxemburg所說的「對自然經濟的駕 馭」(conquest of the natural economy)。

>新自由主義的最後一站

新自由主義的理想已經在它歷史的最後一站得到了證實。財產權孵化出了資本主權; 貪婪的富豪們以最簡陋的手段施行了國家權力; 而透過美國化消費和民粹主義的媒介而增值的超個人主義則證實了名人文化的平庸。美國化和虛無主義中資本主義主體的自決, 是當代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文明中人性的唯一體現。但是這還

不夠,下一步是超人類(trans-human):生物資本和數位資本的技術烏托邦(technotopian)視野。在經歷了數十年的結構性不平等之後,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世界不再與人類有共同的根底。在沒有敵人出現的情況下,這一點更加清楚:蘇聯的社會主義已死、工人階級無產化、大自然被征服、歷史已經終結。這裡無法將事情的矛頭指向任一方,但是這個新自由主義秩序的新右翼、新法西斯主義的後裔——從華盛頓、巴西利亞、新德里、布達佩斯到莫斯科——隨時可以殘酷地粉碎任何對這個烏托邦發起挑戰的事物,同時誤導公眾於這些代罪羔羊——移民、黑人、「穆斯林」、原住民,或誇大任何「恐怖主義的威脅」。

這些政權不惜一切代價捍衛資本主義作為常態,因而時常傾向動用專制和軍事化的暴力。然而,歷史和抗爭都證明了專制政權是多麼不堪一擊,壟斷暴力的方法不能永遠保證和平。甚至連美國軍方都知道,連他們自身都遭受到氣候衝擊時,是無法控制這個氣候混亂的世界。儘管氣候變遷帶給這個社會許多艱困的抉擇,但另一方面,戰爭仍需要稀少且代價昂貴的資源,核武器時代的軍國主義同樣也有所制約。如今殘酷的不平等霸權統治已經結束,然而示威者卻是既不安又絕望,因為COVID-19增加了他們的痛苦。而同時,民主的主體具有全景的眼界以及多樣的數位資源,可以輕易獲取有關社會生態的資訊。這

樣的主體甚至可以從遠處驚嘆帝國權力的愚昧、 觀察獨裁者的笨拙,並瞥見激舞人心的底層在街 道上主張自我的意見。換句話說,儘管資本主義 選擇利用新法西斯主義,甚至武器化數位領域, 那道完全壓迫人民的鐵幕也並非無懈可擊,民主 和社會主義仍將在這個十字路口蓬勃發展。

> 生態謀殺作為資本主義的最後一步

在當前歷史上真正的恐怖不是資本主義的 新法西斯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下的生態謀殺,這 不僅威脅著地球上的生存條件,也威脅著資本主 義本身。這使得法西斯主義的第二次降臨有時間 錯置的感覺。儘管氣候科學已經發出了警告,關 於COVID-19期間碳需求的下降,以及地球上每 週都至少發生了一次重大的氣候衝擊;但看到碳 資本仍持續在全球能源結構中擴大其地位,也 還真是令人不寒而慄。Trump已經允准美國能 有更多的碳提取量, 並將其置於供應上的首位; 而Bolsonaro則是支持種種商業利益,包括:持 續對原住民施行種族滅絕的暴力行為;破壞生 物多樣性;加上撥款實行刀耕火種(slash-andburn)的農作方式,使亞馬遜快速釋放出約1400 億噸的碳排放量。此外,南非的碳統治階級正在 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發電廠。他們誇耀當地水 力壓裂的採油技術,並垂涎三尺於離岸天然氣和 石油的開發前景。這些關於碳犯罪的例子證實, 即使在末日時鐘的敲打下,資本主義及其碳統治 階級仍威脅著包括自己在內的一切事物。

顯然地,資本主義造成的生態破壞,其自我 毀滅的邏輯現在是非常清楚了。自從柏林會議 以來,非洲一直是全球北方的帝國課題,使得流 氓資產階級對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由於氣候 衝擊非洲已經部分瓦解了。據估計,至少有2億 非洲人會因持續加劇的氣候衝擊而流離失所。「 歐洲要塞口和「美國監獄設施」將無法將「野蠻人」 拒之門外,因為這些社會儘管富裕,但受到氣候 衝擊的影響,他們也將面臨嚴重的內部潛在問 題。日出運動(Sunrise movement)、滅絕叛亂 (Extinction Rebellion)和氣候大罷課 (#FridaysForFuture)僅為地球氣溫上升攝氏 1度時所發起的運動。而在氣溫上升1.5度之時, 隨著人們拒絕被非理性、生態法西斯的統治階級 視為附帶損害,在這些不同的社會中將會有更多 人發起響應。

> 走向民主生態社會主義

以下有三種氣候正義的模式,傳達了許多人 生存的希望,而這樣的冀望正被世界看見。這些

充滿生存希望的表達方式,正使兒童及公民們與 氣候正義的力量聚集在一起。首先是對於常態的 象徵性阻饒,最好的例子是Greta Thunberg和 氣候大罷課中孩童的抗議行動。孩子們發出的警 告正彰顯了氣候科學的緊迫性,對孩子來說也正 是如此。其次是使他們陷入碳的僵局,包括以化 石燃料提取電路等,巧妙地進行阻饒。像是呼籲 抵制麥當勞、Walmart和Subway,因為他們跟 亞馬遜的刀耕火種農業有利益上的關係;或是 像Ende Gelände的公民運動,其致力於佔領德 國的煤礦場。第三是通過諸如綠色新政等系統 性替代方法,對生態謀殺的資本主義進行戰略 性的阻饒。這些替代性方法促進了快速減碳、去 軍事化、民主體制改革,從而使人們有能力去推 動公正轉型,以及氣候正義的地緣政治。就像是 Bernie Sanders的《GND》和南非的《氣候正義 憲章》(Climate Justice Charter)等,以政治計 畫為概念的例子。最終,這些力量將扛下對抗帝 國主義生態謀殺邏輯的重擔,以確保全球南方能 夠做出自己對氣候正義的選擇,包括進行深度的 系統性改革,從而推進民主生態社會主義。

至關重要的民主體制改革必須從外圍進一步全球化,透過糧食主權和生態農業達到對世界的「重新農業化」(re-agrarianization)。這是由La Via Campesina於20年前所倡議,地球上的每個社區、村莊、城鎮都必須採用這種民主的生態社會主義方案。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最近的生物多樣性報告,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土地使用報告都強調了這一點。最重要的一點是,單一產業、碳中心和全球化的糧食系統都與我們的滅絕息息相關。

最終,當代社會主義的生態視野將由生物災害(例如:COVID-19)、全球暖化、氣候衝擊、不平等加劇,以及人類對生活的動力來定義。水、土地、生物多樣性、海洋和生物圈等等全球共有地,都將捲入大自然對資本主義生態謀殺的報復之中。自然的無限和人類的有限,將定義社會生態歷史的下一個時期。正是在這一交匯處,民主生態社會主義將能更深入地學習地球生而俱來的傳統,以改善生活、拒絕生產主義,並重新確認與自然疏遠的關係,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積極人本主義」(positive humanism)。在自然界的新陳代謝週期內運轉的緩慢世界,是我們唯一的希望。這樣的世界從來沒有消失過,只是被殖民、新自由主義和帝國暴力所籠罩住。■

來信寄至:

Vishwas Satgar <<u>Vishwas.Satgar@wits.ac.za></u>

> 都市的氣候行動 如何重建社區

Joan Fitzgerald,東北大學,美國



2016年6月,瑪格麗特·戈登女士於西奧克蘭 環境指標項目的某次集會。

攝影: Brooke Anderson,來源:西奧克蘭環

OVID-19的疫情揭開了這座城市的兩種不同樣貌。第一種是這座城市當前種族和族群不平等的真實樣貌。在美國和歐洲城市,低收入地區和有色人種社區的COVID-19死亡率較高。由於他們生活在污染較嚴重的社區,美國的黑人和拉丁裔族群更容易患上哮喘病和其他相關的疾病,也因此使他們面對病毒時更加脆弱。此外,他們也因為從事著低收入工作,使他們更容易接觸到病毒;而擁擠的住屋環境意味著他們無法在家裡保持防疫距離;另一方面,他們的社區也經常缺乏公園、雜貨店等基本的便利設施。

但是這場危機也揭示了一個契機:一個綠 色、平等的復甦機會,將氣候行動與種族、經濟正 義相結合。向我們位於第一線的社區(即那些最 快遭受氣候變化影響,影響也最嚴重的社區),推 廣這一願景是當務之急。大多數城市的氣候行 動計劃不是絕口不提公平兩字,就是只會紙上談 兵;然而,在美國、加拿大和歐洲,有越來越多的 團體正在對市政府施壓,要求政府將關注點置於氣候正義的議題。

> 民主的計劃

計畫是企業的核心。有太多的城市,尤其是美國,計畫是由私人開發商和商業參與者推動。若需要一個民主的結果,需要的是更加民主的計劃。

奧斯汀、馬德里、西雅圖、奧克蘭、波特蘭,普 羅維登斯和維也納等城市,在經過縝密的思考後 最近更新了針對氣候的行動及綜合計劃,使第一 線社區的居民也能參與其中。在最好的情況下, 居民團體與市政官員都能一同製定目標,從司法 角度分析,並共同參與執行的階段。

這些計畫有助於第一線的社區建立社會、環境和經濟永續性。即將實施的《普羅維登斯氣候正義計劃》(Providence Climate Justice

Plan)的首批內容之一,就是建立兩個優先採取計畫的綠色正義區:奧爾尼維爾和南普羅維登斯。這些區域的潛在計畫項目包括:在關鍵設施中建造微電網,以利斷電時能維持電力;節能化(weatherization);開發可再生能源;職業培訓;還有分區改革,以防止污染土地受到使用。

> 綠色正義

綠色正義區將氣候與社會正義的目標結合在一起。這個想法是將氣候和社會正義議題的各個層面結合在一起進行整合,使居民能夠參與社區建設。這個計畫的項目可能包含:可再生能源、房屋的大規模翻新、創造社區空間、創造就業機會、新建淨零耗能(zero-net-energy)學校、新建或改建公園、建立完整街道、建設綠色屋頂,以及種植更多樹木以解決都市的熱島效應和雨水的管理問題。

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市也將執行的重點放在最貧困的社區,並在2020年7月發布的《2030年公平氣候行動計劃》(2030 Equitable Climate Action Plan)中加強了這個部分。該計劃的《種族平等影響評估與實施指南》(Racial Equity Impact Assessment & Implementation Guide)提供了識別第一線社區的標準,以及如何與居民和社區組織共同合作、監測公平結果的策略。

在這個計畫之前,西奧克蘭已經被指定為 奧克蘭的其中一個第一線社區。西奧克蘭有著 三條高速公路、港口、污水處理廠和航空燃料驅動的尖載電廠,這些公共建設都造成了嚴重的 污染,提高了人們哮喘、中風和鬱血性心衰竭的 發生率,也縮短了人們的預期壽命。也因此這個 計畫優先考慮於,對建築物高度減碳以及燃料 轉換——用電力裝置代替天然氣爐具、空間、熱 水器。

燃料轉換可改善室內的空氣品質及減少氣體排放量。如果全面實施,可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18%。此外,如果提高建築能源效率,將進一步減少12%的排放量,並有助於減少家庭的能源負擔——根據一份有明顯差距的數據中指出:低收入家庭在電力和天然氣等公用設施上的支出,在家庭收入上所佔的比例比一般的家庭更高。

> 公民科學

西奧克蘭市之所以能達到成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與長久以來的環境司法團體建立了夥伴關係,這些團體為社區提供了乾淨的空氣,也贏得了大家的信任。自2002年以來,《西奧克蘭環境指標計畫》(West Oakland Environmental Indicators Project)一直致力於改善社區的空氣品質。聯合創始人Margaret Gordon回憶道,她上任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導引著一輛輛冒出柴油煙霧、在港口與社區之間進進出出的卡車。

自那之後,《指標計畫》就持續與環境保護基金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谷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共同合作於公民科學領域,以監控特定地點的空氣品質。他們知道該州的空氣監測系統並沒有發現熱點。其中一個計畫是讓居民站在街角數卡車的數量;而另一方面,他們在老年居民的家中裝設空氣監測儀,讓他們在一天的不同時段中紀錄開、關窗戶監測儀數據上的不同,以找出污染最嚴重的時間點。在另一個計畫中,居民則是接受了Intel的培訓,學習如何從背包中的空氣監測儀下載數據。一旦確定了特定的污染源,他們就可以向政府證明當地必須加強污染防治和清理工作。

經過了所有這些努力,空氣品質得到改善了嗎? Margaret Gordon說,她的窗臺曾經是烏漆墨黑,但現在的顏色已經變成深灰色。顯然地,我們必須減少更多污染,並在這裡採取新的公平氣候行動,而這理應成為我們的首要之務。

但是,城市的計劃施行得並不完善。能實現精細監控計畫的是國家立法和資金,像是2017年通過的《加利福尼亞州議會法案》(California's Assembly Bill (AB) 617)就提供了多方面的資金,支持了以社區為中心的空氣品質監測法。但由於疫情使國家和地方政府資金短缺,許多不錯的計劃都無法實施。也因此,我們必須等待下一個國家行政機構,為綠色新政的提案提供資金。■

來信寄至:

Joan Fitzgerald <jo.fitzgerald@neu.edu>

> 行善背後的 階級與汙名: 印度的封鎖

Mahmudul Hasan Laskar,印度梅加拉亞邦科技大學



印度巴佩塔阿薩姆邦的食品分發,2020年 4月。

來源:Sayantan Roy Choudhury。

了避免COVID-19的盛行,印度政府實行了全國性的封鎖。具階級差異性的隔離措施及封鎖造成不同群體大小不一的影響,這些殘酷現實已引起關注。由於封鎖造成的失業與薪資下降使得貧窮及極端不平等情形更加醒目。其中最嚴峻的情形是富裕與中上階級施加在窮人的糟糕作為。自從封鎖開始,網路上社群媒體便開始風行一些富人向窮人提供物資的照片,而且這些照片是富人自己發出的。這樣行為的目的是什麼呢?這些高度公共化的行徑又將對於真正意義上的重分配造成什麼影響?

>回應的匱乏

這些富裕及有錢的中產階級發送了一定 量的物資給窮人度過一或兩天的日子。但這些 菁英們怎麼不了解這樣只提供一到兩天的餐 點並無法解決問題?這些大資本家明明可以善用社會企業責任(CSR)資金來改善問題,但他們卻以投資這筆資金的方式來生產自己的利益。單單靠政府並無法改善貧窮,除非資本家願意伸出援手,而且確保提供不只把工廠工人當作生產工具的「好工作」。.

社群媒體上的照片呈現出富人在自家大宅院前發送紓困物資給列隊在庭院的窮苦民眾, 這讓人聯想到封建模式中的社會階級。紓困物資包裡主要是半升或一升的食用油、兩到三公斤的米和餅乾、一到兩塊肥皂、一到兩公斤的洋蔥和馬鈴薯。這些物資到底能不能讓人活過超過兩個月的封鎖期是值得反思的議題。窮苦家庭小孩的教育和健康呢?當富裕人家享有線上學習的科技產品和技術時,他們根本沒想過窮苦人家的孩子難以獲得教育資源的問題。

>>

> 藉由慈善來拉抬自己

因疫情帶來的封鎖反而成為這些有野心的 社會工作工作人員展現他們虛假的領導力並藉 此獲取政治利益。發放紓困物資給窮人已成為一 種地位象徵,且這種行為被刻意地展現在社群媒 體上。這些假社工刻意地操弄這些給人的印象 並牟取自利。在臉書上有許多詭異的照片呈現人 們在路邊或市場發送食物包。飢餓的展現並不是 種驕傲的展現,而是羞辱,但那些富裕的人們將 發送食物視為一種獎勵儀式。發送食物的行為經 由社群媒體被光榮化,彷彿飢餓窮苦的民眾將以 這些食物包度過餘生。舉例來說,在阿薩姆邦的 Guwahati市有包括攝影師三人向路邊的菜販 發放口罩,整個過程被高檔的攝影機記錄下來。 因封城而被困住的移工剎那間成為都市中產階 級和特定群體關心的對象。在疫情導致得封鎖 前,這些所謂的社會運動者根本不關心窮苦移 工,因為他們忙著追社群軟體流量。

> 羞辱與尊嚴

這些自我中心的富人以窮苦人家的尊嚴為代價,炫耀自己的慈善形象。這些富人的社會服務只有惡化窮苦人們的境況。窮苦人們為自己的尊嚴、生命和小孩而焦慮,因為他們的脆弱經由富人的社會服務散播到了社群媒體。他們的貧窮因為荒謬的攝錄方式而成為汙名。社區中的富人盛典式的發送物資,然而其他人只能無助且帶有罪惡感的接受。現在這些窮苦之人將在這些富裕鄰居的虛假同情壓力下過活。窮苦人家的小孩可能在學校難以建立自信,因為這些富人展演的社福工作毫不掩飾地將他們的貧窮曝露出來。貧窮的表達本身並不羞恥,但將窮苦人以這種社會福利表演當作是乞丐,這是十分羞辱的事情。這是為什麼貧窮或弱勢的群體有自我文化和慣習認

同的原因。自尊的減損已經在印度社會發生,因 為印度經濟中一度能自給且富有活力的農業逐 漸走下坡。工業化創造了勞力和雇傭勞動市場, 大批原本能自立的農民現在成為城市中的窮苦 移工。

> 真正的解決之道

來自農村的移工議題已經成為假道學和社福工作的關注主題。但對於那些問題的解決之道是十分不同的,包括回到自立的農業、以保護生計和自然資源的環境主義以及支持在地住民的小規模農業企業。以上這些提案都能為移工和貧窮議題提供真正的解決之道,但不幸的是許多實體或網路的研討會及社群媒體的文章淪於膚淺的討論,沒有對問題有更多的有效論述。

特定群體在社群媒體上競爭或炫耀物資或 食物的發送的照片影響了窮苦民眾的尊嚴。這無 法提供長遠的解決之道。如果富人是認真想要幫 助窮苦民眾,他們不應該將財富重分配的舉動視 為一種地位或傲慢的表演。■

來信寄至:

Mahmudul Hasan Laskar <<u>rhasanlaskaramu@gmail.com</u>>

> 照護的稀少性? 照護移民與政治人口學

Attila Melegh,布達佩斯考文紐斯大學,匈牙利

2010年,人道關懷已成為全球特定的社會議題。自1980年代以來,在高齡化、持續的市場化(不重視再分配),以及農民的消亡三者間出現一個特殊的相互作用。這些因素及歷史動態導致照護人員稀缺,以及相關的照護移民產業急劇增加。這使移民照護工陷入更艱難的處境,特別在COVID-19疫情的持續下,獲得醫療照護的管道在全球顯得更加重要。全球有很大一部份的人口-不僅是貧窮國家-都日益依賴於以移民勞動力為基礎的各式照護系統。同時,移民工作者也陷入照護工作需求增加、就業狀況日趨不穩定、對移民的敵意加劇,以及受疫情而日漸嚴密的安全監控等多重問題。現況來看,提供給病人及長者的照護資源已變得更加競爭且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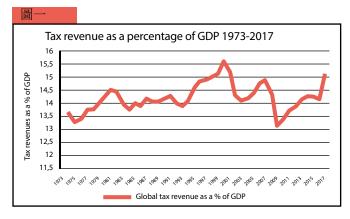
> 日漸增加的家庭和醫療照護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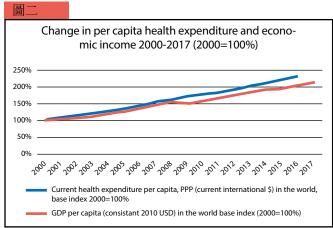
雖然目前仍缺乏針對家庭與健康照護人 員的全球系統性數據,不過根據國際勞工組織 (ILO)估計,在2015年時,全球大約有6,710 萬名家庭照護工,其中1,150萬為移民、近四 分之三為女性,同時,醫療照護移民也有所增 加。世界衛生組織(WHO)2013年的估算顯示, 醫護人員短缺1,740萬人,並預計相關需求將 急劇增加,只能通過增加移民來解決。在2007 至2016年間,相對富裕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國家(不包括美國),接受國外培訓的 護士數量增加至少80%,醫生的數量則至少增 加45%。在2016年,上述國家的國外受訓醫生 人數達到近50萬,護士人數遠超過30萬。在某 些國家,外國出生的醫生比率上升至少10個百 分點,達到整體的40%或50%(在COVID-19疫 情期間,許多醫生因當地或該國封境而無法移 動)。

> 高齡化、醫療費用上升和不變的重分配

人口迅速地高齡化以及對需受撫養長輩的 照護,不論在勞動生產力或實際照護需求方面, 都給年輕一代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尤其在全球的國家重分配持續停滯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正如József Böröcz(2016)在其與工作相關的社會提撥(social contribution)的研究中所見。此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國內生產毛額(GDP)中的稅收收入分配(再分配率)在全球都出現停滯的現象,平均約在14%上下。同時,至少自2000年代以來,人均醫療保健支出一直以高於人均GDP增長的速度上升(見圖1和2);在世界各地,受撫養的高齡者也從9.5%增加到13.2%(見圖3)。這其中,包含高齡化的歐洲,也有人口相對年輕的國家。

直到2010年,世界人口高齡化的速度低於 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這意味著,儘管再分配率 穩定,但可用於公共和私人老年照護費用的資源 卻不斷增加。然而,從2010年開始,高齡人口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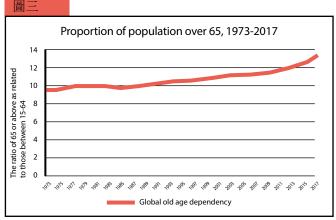




來源: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養比的增長速度快於經濟成長的速度。 這意味 著人均健康支出所需的收入可以來自其他的私 人資源(依靠人們自己的收入在市場上購買此類 服務的比例不斷增加),和/或與健康相關的公共 支出所佔的比例正在增加,犧牲的是其他的公共 目標。 反過來說,這種重組必然會導致社會和健 康產品的市場競爭和福利競爭加劇,使得照護移 民工為自己尋求社會保護更加困難。

這一連串的問題可能使遷移在各方面更加複雜。移民可能從其工資和匯回母國的錢中購買福利服務,或是試圖藉由移入其他國家,以尋求他國福利系統的保障。除此之外,具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卻不友善的移入國家可以同時懲罰移民,並要求他們的社會貢獻,以改善稅收在高齡化、社會和健康需求,以及公共支出之間的平衡。此外,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不僅在地方團體間、地方團體與移民之間,而且在移民團體本身之間,也存在明顯的競爭跡象;從對東歐護理人員的訪談中可見得,他們拒絕「昂貴」地保護接踵而來的難民。 COVID-19疫情只加劇這些緊張的局勢,而我們尚未看到當前經濟危機的終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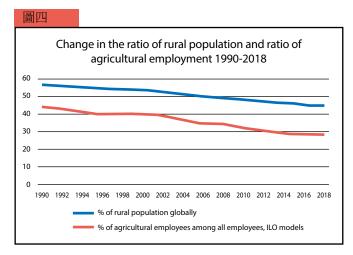


來源: $\underline{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全球照護的競爭與國家保護

霍布斯邦在《極端的年代》中提出「農民之死(death of the peasantry)」後,由於國家重分配和高齡化比率的變化,這種矛盾變得尤為嚴重。農業就業人口從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持續快速地下降,到了2018年,全球已下降到30%以下。與城市人口相比,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農村人口成為少數。與歷史上重要的鄉村家庭體

系相比,由於高齡化所致的照護負擔將逐漸地 導向市場和國家重分配體系。這意味著,仰賴家 庭照護的老年照護將減少。即使在較貧窮的國 家,直接提供家中長者食品和物資的情況已日 漸減少,相反的,對於購買國家和市場的健康與 社會服務(包括由當地人或移民工所提供的高 龄照護)有所需求。這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轉 變之一,並已成為全球化時代的決定性時刻(圖 4)。



來源: http://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這意味著將加劇市場化的進一步發展,也反過來加深對於國家保護的反需求,這是威權民族主義的理想結合。因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中,與照護稀缺相關的矛盾可能是轉型的根源。因此,在COVID疫情期間及之後,政治人口的辯論將加劇,普遍的社會保護和經濟體系的根本變化將被視為矛盾的市場化的替代方案。而情況也的確是如此。■

來信寄至:

Attila Melegh <attila.melegh@uni-corvinus.hu>

> COVID-19

能終結全球化現象嗎?

Iliana Olivié 及 Manuel Gracia,埃爾卡諾皇家學院和馬德里孔普盧騰斯大學,西班牙

今的全球化進程,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當時全球經濟經歷了成長、緊縮及變異的各個階段。這些現象可以回應到當時全球經濟市場及地緣政治秩序的結構性變遷,包含了亞洲幾個新興經濟強權的興起,以及全球活動連帶的自大西洋轉移至風起雲湧的太平洋地區。

發生在2000年代末葉及2010年代前期的經濟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大幅改變了全球經濟,在Elcano研究院提出的「全球影響力指標」(the Elcano Global Presence Index)中,反映出這些改變加速並加劇了前並幾項結構性變遷連鎖效應的趨勢。現在面臨的衛生、經濟、政治及社會危機同時也對國際關係及全球化的進程造成負面影響。

雖說預測全盤局勢走向仍言之過早,但我們已經可以窺見這些危機帶來的苦果,像是全球產銷鏈的斷裂,以及連帶停擺的貿易活動。我們也不難預測一些國際人流戲劇性地減少後所帶來的效應。

>疫情之前:早已走向去全球化的世界

在20世紀的末三十年裡,各國大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這使得國際間的經濟流動急遽提升。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多方浪潮總是伴隨著跨國界的人口(協防駐紮軍力、移民、觀光客、學生、國際賽事的運動員以及國際移工)及思想(資訊、文化、科學、科技與教育的交流),這些不同形式的國際化現象而移動。即使全球化在學院裡的定義中常標誌出其他非經濟取向的概念,對於國際化歷程的分析依舊傾向經濟的向度。

對經濟層面的格外關注須對部分對於全球 化現象的預測負起責任。這些預測指出,全球化 將走向趨緩、終結,或甚至進入2008年的金融危 機時的「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及伴 隨來的經濟大衰退。

而當特定貿易鏈及外商直接投資的經濟國際化現象的成長趨緩(甚至是在特定年份對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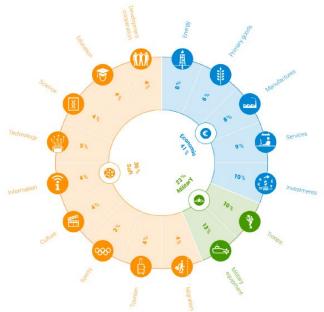
定市場條件的變動),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顯示,即使國際化轉而以更為隱微的形式運作,成長也顯著地走向遲緩,全球化現象卻並未走向回頭路。

涵蓋130個國家、充斥各種變量及向度,全球活動的附加價值著實影響著全球物資交流總量,並因而得以作為衡量全球化程度的指標(圖1)。

奠基於這項指標的走向,我們可以檢視幾個全球化的時期:(a) 1990年到1995年間,與歐洲地緣政治的重組態勢相符,全球活動在此階段得到整合,使年均值減少1.6%。(b) 這屬於全球化的第二階段,承接了自1995年到2011年的成果,總計有57%的成長。(c) 後大衰退時期,消長的歷程和緩,年均成長約1%。(d) 緊接著來到一個急遽成長的階段,有超過5%的成長,全球交流活動量因而回到經濟危機前的成績。(e) 近期。30年內最大的年度負成長紀錄,現在已短少了2.6%。(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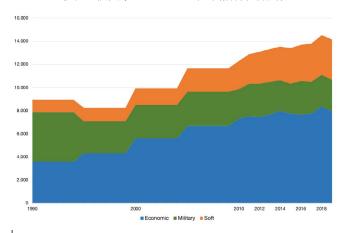
各個變量及向度(經濟、軍事與軟性交流層次)也在這個階段以不同的途徑影響著全球化的演進速度。在1990年到2005年間,全球化的主要動力在於經濟交流。

圖一: Elcano全球業務指標



來源:Elcano皇家研究所,Elcano全球業務指標。

圖二:全球業務提升的價值 (共130個國家,1990-2019年,以指標值點計)。



來源:Elcano皇家研究所,Elcano全球業務指標。

相較於軍事交流為全球化帶來特定方面的 緊縮,軟性交流的層次則提供全球化一個適中而 正向的成長助力。

然而,這樣的趨勢在2000年代得到顯著改變,軟性交流在此時開始成為領導著全球化現象的力量。至於在晚近幾年,全球活動的成長與衰退則主要均因著經濟表現而波動。

>疫情來臨:COVID-19對全球交換體系的影響

需要強調的是,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呈現了結構性的趨勢,這代表短期的金融市場動盪及暫時的政治局面變化將不會對其結果造成影響。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在全球活動的向度與變量有所異動後,有兩年左右的延遲,才能將變易反映在指標中。

2008及09兩年間的金融危機所引發的效應 便直到2011年才顯現,而COVID-19的疫情對 全球活動帶來的影響也不被預期在2021或2022 年前被登錄在數值上。

儘管這次疫情在不同領域帶來的短、中、長程衝擊已經被不同的作者與機構預報與預估過了,但要論及全球化的整體圖像則依舊未完成。其中一個探知這次衛生危機後勢(以及在全球尺度及由各國發展出的政治應對措施)的方法是以基於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的附加價值之上、經濟大衰敗的後續效應來觀察幾個可能的局勢走向。

>局面A:2008年的危機重演

如果現在面臨的衛生緊急事件與其在經濟、 政治與社會層面帶來的改變與2008年前次危機 相似的話,那麼我們便可以預期Elcano全球影響力指標在各個變量及向度的變化會像是2010到2015年的走勢。

>局面B:比2008年更糟的情况

部分論者指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局勢變化 將會比2008年的危機來的更深遠且具毀滅性。 那麼,在這樣的局勢裡,那個由眾多要素組成的 指標或許將會自2022年起便在每一個項目裡都 呈現所有可能的情況中最糟的圖像。

>局面C:不同於2008年的危機

最後,這次危機中的部分跡象及其與2008年的差異可能代表著這次將不同與前次。預報及預估指出,這次危機在經濟要素的影響將與大衰退時相似,而在軟性交流的層次則更甚上回,因為疫情帶來的是跨境流動的人口(駐軍發展、教育、移民與旅客等變量均被影響)戲劇性的減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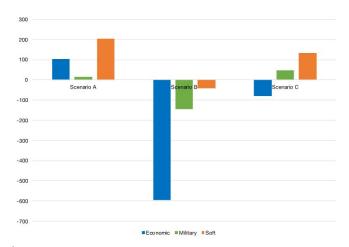
在這個版本的局勢走向裡,16個變量(基本的推論及原理詳見連結)中每一個項目的預期表現都將把結果導向當前危機與2008年危機對全球化衝擊不同的局面,即局面C。(圖3)

圖三:COVID-19後全球化的 三種情景(%)

	Scenario A Crisis similar to 2008 Average rate (2010-15)	Scenario B Crisis worse than 2008 Larger reduction (2010-18)	Scenario C Different crisis to 2008
Energy	6.8	-36.2	-11.1
Primary goods	4.3	-7.5	-1.1
Manufactures	2.6	-3.4	-0.7
Services	1.7	-0.7	-0.7
Investments	-0.3	-8.9	-0.3
Troops	-4.0	-10.2	5.7
Military equipment	3.7	-2.0	-1.0
Migration	1.4	-1.0	-1.0
Tourism	3.7	2.0	2.0
Sports	-0.8	-1.7	-1.7
Culture	7.3	-8.9	-1.8
Information	16.9	-1.4	16.9
Technology	4.2	1.7	4.2
Science	5.0	3.4	5.0
Education	5.2	0.1	0.1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2.6	-4.8	4.1

來源: Elcano皇家研究所, Elcano全球業務指標。

圖四:在A、B和C情景下的預測全球業務總和 (指數相對於2019年的值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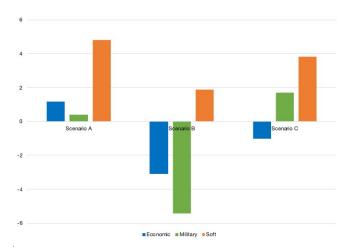
來源:作者,以Elcano全球業務指數為基礎推測。

在前述的三種局面裡,只有局面B將帶來強力的去全球化現象,而這背後是來自130個國家在全球活動總量中各從2019年的數值水準降低1%。這將影響到全球化的所有向度,特別是經濟面向(這無庸置疑)及軍事面向(相對而言)。

然而,如果這樣的轉變勢態更傾向類似於前次危機(即局面A),我們可以預期全球化的現象將會持續(全球活動總量增加1.7%),軟性交流的成長將得以累積,而經濟面向的全球活動交流成長則居次。

最後,以一個不同於以往的發展態勢將讓我們看到一個近乎停擺的、僅成長0.7%的全球化光景。我們會在這個局面裡看到更為活躍的軟性交流,卻也被陷入微幅縮減的經濟交流活動所抵銷。(圖4及圖5)

圖五:在A、B和C情景下的預測全球業務總和 (該指數相對於2019年的變化百分比)



來源:作者,以Elcano全球業務指數為基礎推測。

簡言之,當前的危機將在國際關係上造成衝擊,結果將類似於2000年代後期的危機。我們可以預期看見結構性變遷的加速進行,而那也正是我們早就可以預見的全球化進程。■

來信寄至: Iliana Olivié <u><iolivie@rielcano.org</u>> Manuel Gracia <u><mgracia@rielcano.org</u>>

> 面對COVID-19:

中歐的居家照護

Brigitte Aulenbacher, 約翰開普勒林茲大學, 奧地利, ISA 經濟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 貧窮、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委員會(RC19), 工作社會學委員會(RC30)與婦女、性別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32)成員; Petra Ezzeddine, 布拉格查理大學, 捷克; Dóra Gábriel, 匈牙利人口學研究所; Michael Leiblfinger, 約翰開普勒林茲大學, 奧地利, ISA RC19 與 RC30委員會成員; Kinga Milankovics, Hekate自覺老齡基金會, 匈牙利; Veronika Prieler, 約翰開普勒林茲大學, 奧地利, ISA RC19 與 RC32委員會成員



為通勤者設計的口罩,這樣他們就可以立即被識別為在匈牙利-奧地利邊境工作的人。

中歐,居家照護已經成為高齡照護體系中越來越重要的支柱。主要為移民女性的照護工作者在照顧需求者家中生活與工作。他們的工作職責從家庭事務到醫療照護。針對居家照護的法規因國家而異,但不穩定的工作條件是其中的共通點。中歐的居家照護是根據移徒勞工為基礎,仲介經常由貧窮國家招募照護工作者,因此,這群勞工被迫接受國外的任何工作。這種模式能夠運行的先決條件是,歐盟成員國內的勞工或多或少能夠自由流動,然而,在疫情期間因邊界關閉,人們不再認為這種模式是理所當然。本文透過介紹奧地利、捷克與匈牙利當前居家照護處境以及各自不同的居家照護模式,並分析疫情對居家照護的影響。

> 奧地利、捷克與匈牙利的居家照護

在奥地利,居家照護在法律上被視為一種專 業。一般而言,兩個照護工作者每二至四星期會 在一個家庭中輪換一次。照護工作者是自僱人 員,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但卻沒有獲得最低工資、 帶薪休假與病假的權利。與奧地利不同,捷克與 匈牙利同時是照護工作者的供給及接受國。兩國 的照護工作者主要流向德語區國家一奧利地與 德國。而對捷克而言,為私人家庭提供照護移工 是一個新現象,烏克蘭則是一個重要的來源國。 儘管如此,捷克的居家照護行業規模仍然很小, 並且需要獲得(非歐盟)移民勞工的居留許可證 則取決於有效的僱傭合約。因為語言文化的連 結,匈牙利則主要接收來自烏克蘭與羅馬尼亞的 匈牙利族裔照護工作者,他們不一定會往西歐國 家尋求更高的薪資酬勞。此外,匈牙利大多數居 家照護移工都是非正式工作,儘管仍有部分是正 式的就業機會。

>疫情帶來的挑戰

隨著疫情的蔓延,不僅是中歐國家關閉國界,且在未來這段時間內,仍將停止跨國界勞動人口的流動。在奧地利,疫情使居家照護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亦成為不同行動者的目標,希望是能在不變的情況下持續努力,而非尋找其他替代方案。德國、奧地利與捷克政府成功建立照護通道,而匈牙利的照護工作者同樣能夠自由進入奧地利。照護工作者開始考慮他們是否應該留在家中一這意味著他們收入損失,或是在工作國停留。在奧地利,當聯邦政府提供一次免稅的500歐元激勵獎金,許多照護工作者因此延長輪班時間。在三月底至五月期間,照護工作者搭乘自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與羅馬尼亞的三架包機與六輛來自羅馬尼亞的火車前往奧地利。剛開始,照

護工作者都需在旅館中進行14天的無薪隔離。 隨著六月中旬中歐邊界重新開放,定期的旅途路 線再次向遷移勞工開放。

在疫情前幾個月,因實行嚴格的跨境制 度,越過邊境返回捷克的照護工作者需要再 家強制自我隔離14天。此外,他們還需要提供 COVID-19陰性結果,並每14天自費重新進行檢 測。主流媒體報導因而將捷克遷移勞工描述為 重大的公共衛生威脅。正如護理人員在線上的 報告,照護工作者的家人正面臨社會汙名化,因 為他們是當地社區潛在的病毒攜帶者。在疫情 初期,烏克蘭的照護工作者經常表現出不安全 感、恐懼感,以及他們擔心最終將面臨失業、並 困在捷克而無法返回家園。時至五月四號,內政 部才提出一項新規定,如果在緊急狀態下移工 失業,將取消為期六十天的新居留證。與媒體對 捷克移工狀況的大量報導成對比,即便在針對 關鍵基礎勞動力的社會重要性、以及迫切需要 提供他們保護性設備的一般論述中,在捷克的 外籍照護者處境仍相對缺乏討論。

在匈牙利,欠缺如奧地利與捷克的媒體報 導,政府對疫情的反應帶給年長者與護理人員 強大的壓力:成千上萬的患者被迫離開醫院回 家,以騰出足夠的病床提供潛在COVID-19患者 使用。這造成對護理相關工作額外的需求,但與 此同時從羅馬尼亞與烏克蘭來的護理人員大多 返回祖國或無法順利入境匈牙利。由於許多人 因疫情失業,隨之而來的是居家照護市場的動 盪,民眾對支付護理服務的意願似乎下降了。因 奥地利提供工作獎金,許多匈牙利籍的照護工 作者願意在奧地利待更長的時間,其他人則因 需要承擔家中更多的照護義務而無法或不願重 返工作崗位。在社群媒體上,在奧工作的匈牙利 照護工作者對於運送羅馬尼亞籍照護工作者的 措施表示不滿。許多人認為,給予一個移民群體 這種特權將可能會增加自己未來就業的風險。

> 結論

在疫情期間,勞動接收國與提供國的工作條件都進一步遭受破壞。儘管在疫情期間存在潛在健康、其他風險與限制,但因母國面臨更惡劣的條件,移工只能被迫接受外國提供的工作。跨境照護勞動力市場常被描述為一個雙贏的結果,其中,老年人獲得能負擔起的照護,外國照護工作者則能夠獲得比國內多數家庭都還要高

的薪資。實際上,這個中歐醫療市場建立在平等 與一體化的歐洲神話中,卻創造出一個以國籍 為基礎的結構不平等、形成對勞動力的跨國剝 削與排斥。儘管疫情使居家照護的脆弱性重新獲 得關注,但照護工作者與受照護者的需求大多沒 有獲得滿足,或沒有充分的解決。正因邊境關閉, 需要照顧的人與其親屬因缺乏公眾支持而焦慮。 儘管有許多措施旨在確保繼續提供居家照護,但 勞工在疫情前已相對不穩定的生活與工作條件, 現在仍然受到忽視。由於社會關係的疏遠,以及 被照護者及其親屬間的距離,照護工作者面臨越 來越多的工作量與社會隔離。對他們而言,跨國 流動可能帶來傳染病或必須被隔離的風險,困在 母國則會面臨經濟上的匱乏。雖然已有關於照護 工作者系統重要性的相關論述,但他們仍然被 視為是對公共衛生與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威脅。 因此,疫情下的社會與經濟負擔最終還是落在遷 移勞工的肩上。■

來信寄至:

Brigitte Aulenbacher <<u>brigitte.aulenbacher@jku.at</u>>
Petra Ezzeddine <<u>petra.ezzeddine@fhs.cuni.cz</u>>
Dóra Gábriel <<u>gabriel@demografia.hu</u>>
Michael Leiblfinger <<u>michael.leiblfinger@jku.at</u>>
Kinga Milankovics <<u>kinga@hekatefoundation.org</u>>
Veronika Prieler <<u>veronika.prieler@jku.at</u>>

> 南亞封鎖期間的 公共社會學

Dev Nath Pathak,印度南亞大學



Arbu繪。

以控制冠狀病毒擴散為目標的封鎖 之下,從人的情感、苦難、社會政治危 機等角度重新思考南亞的機會,再次 消逝了。讓我們快速地回顧這些事件的片段,可 能有助於對事情有更好的理解。最近,尼泊爾和 印度兩國針對一塊喜馬拉雅山陸地:卡拉帕尼 的古老爭議再度展開,呼應了過往關於地緣政 治國家的論述。此時正值封鎖期間,社會也面臨 移工返鄉風潮所引發的危機。針對這點尤須指 出,封鎖期間SAARC(南亞區域合作聯盟)針對 COVID-19所舉辦的會議,最終以失敗收場,再 次揭示南亞不過是幾個成員國之間的遊戲。其 運作通常是成員國參與偶爾才舉行的會議,且 這些會議也淪為一場圍繞著他們慷慨捐助的共 同資金、共享的戰略利益和雙邊關係、安全與保 障的脫口秀。現場幾乎沒有任何空間容納人們 的情感、社會文化動態、聯繫和交流。很少有人 意識到,南亞作為一個尚未被充分開發的社會 實體,需要根據這個地區的共同情感,探討跨越

國家疆界的同情、同理和合作。一個令人不安的去人化南亞觀點,主導並掩蓋了這個地區人們的情感、痛苦和焦慮。簡言之,在一個「冷血」的目標(即所謂的「COVID外交」)的主導下,關於南亞苦難、焦慮和情緒的公共社會學,完全沒有機會出現。因此,一個以人與人的掙扎和奮鬥作為核心、情感真實的南亞社會學,仍然是個未竟的事業。

> 移工的危機

也許COVID-19普遍帶來的影響反而是正面的:這打擊了許多人原先自以為聰明的偽裝,包括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自稱了解移民工人的知識分子階級。移工議題頓時在整個地區受到關注,他們具備著雙重的社會存在,通常被稱作「一腳在城市、一腳在村裡」。針對正式和非正式經濟部門中的眾多工人,所有宣稱了解他們的人,都被發現仍在探尋著答案。報紙和網站上的一系

列評論,只呈現了一些難以理解的政策術語,或是有關這地區城鄉差距的陳腔濫調。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的缺陷就變得非常明顯了。我們目睹了疫情期間,整個區域行政體系和危機處理體系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顯不尋常的場景,如破壞器皿、照明燈,和印度出動空軍直升機撒花瓣在醫療工作者頭上。由於整個南亞地區的政策和行動不當,疫情更加地成為人們恐慌的來源。也許有些零星的例外情況,但南亞各國普遍面對疫情時體察人心的方式仍是失敗的。

在這個情況下,移工的返鄉成為一個普遍危 機,凸顯了這個地區缺乏具同理心的態度。整個 南亞針對COVID-19的討論都圍繞著移民的複 雜性。每個人突然都想起了一個古老的事實:移 工是經濟的重要骨幹。南亞城市中的每一個中產 階級家庭,都是在移工的幫助下才得以蓬勃發 展。然而不幸的是,這些工人僅被視為機器中的 齒輪,而不是具有情緒、急迫性和感受能力的重 要個體。這在整個區域十分常見。即便製衣業為 孟加拉貢獻了大量就業人口,孟加拉卻不夠重視 國內製衣業的混亂,使得許多工人必須在達卡和 他們的家鄉或村莊之間來回步行往返,希望能找 到工作。孟加拉也沒有為印度和尼泊爾等遠方工 人規劃返鄉方式。在印度,曾經為匯款經濟做出 貢獻的工人,回到印度後卻淪為沒有國族的移 民。可以說,他們只回到了一個不感恩的國家。從 印度返回尼泊爾的尼泊爾工人得徒步走很長的 艱苦路程,途中卻得不到任何照顧。在印度,不同 階級得到不同的安排:移居國外的移民返國時會 被安排班機,但在國內遷移的人返鄉卻得不到任 何協助。儘管有關巴基斯坦的報告嚴重不足,但 當地工人的處境也不是很值得稱讚。這些工人,

無論來自正式部門還是非正式部門,都僅被視為 可供買賣的勞動力。他們不被當成有情感、神話、 民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人。這代表我們有需要 將「南亞」重新定義為由工人所組成的社會類別。

> 忠實於情感的南亞社會學

我們應該避免國家或地緣政治這些盛行於 南亞的主流觀點,以探索一種細微且忠實呈現情 感的南亞社會學。藉由這樣的社會學,我們可以 打造一個新穎的烏托邦、一個屬於人民的南亞, 在其中,情感和理性可以結合起來,進而更完善 地理解社會現實。這樣的社會學應該要能感知到 情緒流動的群眾。因為在情感相對不穩定的框架 內,我們可能會彼此更拉近一點,變得平等、有能 力同理並具有同情心。不幸的是,印度飽受讚揚 的政策「鄰國優先」實際上更像是外交噱頭,而不 是社會文化團結的核心綱領。這項政策隱含了印 度比鄰國優越、因此應該照顧它們的內涵。由於 這種優越性,面對疫情帶來的國家衰落、人民日 益提升的痛苦、希望的缺乏, 這項政策便分崩離 析了。比起政策噱頭,我們更該做的是所有人,無 論是在國界以內或之外,都能攜手一同走出這個 挑戰。■

來信寄至:

Dev Nath Pathak <dev@soc.sau.ac.in>

> 直面疫情的 公共社會學

Michele Grigolo 及 Craig Lundy, 諾丁漢特倫特大學, 英國

日,公共社會學飽受各方質疑與挑戰。COVID-19疫情的散播使得社會中的不平等與族群間的差距再被擴大,同時也讓大眾集體意識凌駕於個人利益之上;這樣的得利思維深植於社會的不同層面(當中包含了教育場域),並再三傳頌著此次疫情已經(也因此正如他們所聲稱地)得到控制。我們希望能以這篇文章拋磚引玉,在這次全球流行的疫情中,帶動一系列公共社會學觀點的響應;也遞出橄欖枝,希望能有機會與以有志一同的夥伴們發展更深刻的連結與合作關係。我們想要在本篇文章中分享英國本地諾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簡稱NTU)以公共社會學參與相關討論的經驗,尤其是以公共社會學為核心的碩士學程如何參與其中。

在正文開始之前,我們想先談談何謂我們口 中的「公共社會學」。Michael Burawoy於2005 年以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簡稱ASA)主席的身分,發表了一 場影響深遠的演說,當中提到「公共社會學」是社 會學家與其所欲溝通的「群眾」間共同生成及凝 聚討論議題的對話過程。我們同意這樣的說法。 然而,對我們而言,就讀於我們所開辦、社會學碩 士學程的學生們並不只是與我們最直接接觸的 第一線「群眾」,我們將他們視為公共社會學家; 基於他們自身的條件,他們理應被這麼對待。在 我們的學程中,學生們一旦加入,便並不純然是 受教者,同時也是與我們一起行動的知識生產者 及社群參與者。這同時也表示本校的公共社會學 論述圍繞並追求著教學、研究與實踐三者間如何 相互推進與循環的關係。好比夜空中的星座,單 一個星點需要與其他的星點有所連結,才具有意 義,組成元素間需要彼此的相伴與支援。當然, 並不是所有公共社會學的社群活動都需要如此

直接地涵蓋前述「鐵三角」的所有項目;但確實依舊存在不少如我們所說,無法切割出「教學」、「研究」與「實踐」的情形。就某方面來說,這些社群活動的成果也能達到強化三者間連結的效果。

這樣的觀點在課程內容及組織架構等面向,都引領著我們的社會學碩士學程。從理論、方法論到實務操作,我們的課程模組觸及公共社會學的不同面向及取徑。在我們的服務學習模組中,學生需要與在地非營利組織共事,構築一個以自己所長為出發點、且符合組織需求及期望的專案。這些規劃希望學生能夠投入其中,學生參與實踐的過程不僅能帶來改變,也能從中學習知識,達成與大眾「共學」,而非僅是「上學」。以這樣的合作為基礎,學生們將完成一份關於夥伴組織的報告,或是依其意願,完成一份學術性期刊論文。他們可以盡可能提早在這兩個形式中的其中之一做出選擇,擬定他們在學程中的實踐計畫及為公共社會學帶來的貢獻,作為他們的學位論文。

儘管我們團隊成員間有許多共同價值(像是對社會正義的認同、前述公共社會學的鐵三角論述),但在追求公共社會學的路上,我們的成員間向來不乏多元性與異質性。此外,本校推行公共社會學的現況也正蓬勃發展,我們向他人取經、也得到集體的成長,我們將這兩項成果視為很大的進展。這樣的成果也協助我們解釋公共社會學對我們而言實際上更像是「批判公共社會學」,加入「批判」二字,揭示了我們更傾向鼓勵以批判的視角觀察及投入現場工作。

除了碩士學程,我們也尋求其他途徑 實踐批判公共社會學。2017年時,我們在英 國社會學協會的資助下,在學校辦了一場

「這並非關於恢復正常,因為正常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批判公共社會學的研討會;2019年,我們幾位成員(Burton、Hutchings、Lundy和Lyons-Lewis)也以〈服務學習實踐複雜性的評量:因應複雜系統的理論〉為題,在《高等教育延伸與擴張(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Outreach and Engagement)》發表我們在教育學上的研究成果。我們也有部分成員投入參與式行動研究,以實證精神探究第三部門組織的勞動及聘雇狀況,也有成員做的是一些新興的議題(如:諾丁漢在地的人權議題)。在這些行動中,學術研究者、學生及社區夥伴們都充分參與其中,為了共同的利益一起做事。

眼下,全球大流行的疫情態勢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對批判公共社會學的期待。讓我們先從下列問題出發:「這次疫情何以加劇既有的社會不平等?」、「哪些指標是我們在衡量與討論這次疫情帶來的影響時所需要的?」、「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怎麼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應該因而改變工作方向及內容嗎?」對我們而言,所有對應到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應該要回歸到教學、研究與實踐三個面向上。就在撰寫這份文稿的此刻(2020年5月),英國政府開始針對封城禁令予以解禁。我們的社區夥伴們也紛紛開始討論起COVID-19如何影響了他們自身及諾丁漢的弱勢社群。展望未來,我們的構想已經搶下先機,帶我們看到公共社會學可以作為這次疫情

的最佳解,某方面這維持了社區的韌性及賦權了 社區行動。高等教育部門在這波疫情裡大失各方 財源,身受其害的我們對疫情為社會帶來的高度 不確定性與不穩定性能否提供一個抵抗主導英 國教育體系的得利思維並重塑教育意涵與樣貌 的機會感到好奇。

說到頭來,我們想要在更強烈且更龐大的社 群歸屬感中走出這次疫情的陰霾。以批判公共社 會學家的身分對抗現在的封城狀態為人們所帶 來的孤立與恐懼是重要的,我們要一而再、再而 三地提倡社群、乃至社會的中心地位,並重建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所談論的, 並非如何回復 正常,因為正如已經被指出的種種說法,所謂的 「正常」其實也是眼下所面臨問題的一部份。我 們所追求的,是如何讓情況可以更進一步,達到 更好的境地。我們猜想,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可 以以批判的視野達到這些目標。基於上述幾點理 由,我們想要聽到更多其他公共社會學的研究者 及學生的計畫及想法。我們滿懷希望,期待能在 締結彼此關係的同時,也能尋求與賦予公共社會 學的研究領域更多意義。如果對於參與這場大對 話有興趣,請與我們聯繫。■

來信寄至:

Michele Grigolo <<u>michele.grigolo@ntu.ac.uk</u>> Craig Lundy <u><craig.lundy@ntu.ac.uk</u>>

> 保持社交距離: 社會學的視角

Syed Farid Alatas, 新加坡國立大學



人們在Covid-19疫情期間保持物理 上的距離。來源: Mick Baker/flickr. com. 保留部分權利。

個標題其實只是向讀者介紹社會學的藉口。為了答謝你們縱容我的任性,文章最終還是會討論到保持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並指出這個名詞的錯用。但為了能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先搞清楚社會學是什麼。

> 社會學是什麼?

我們可以從這門學科的創始人伊本赫勒敦 (Abd al-Rahman Ibn Khaldun,1332-1406) 談起,他是前現代時期最傑出的穆斯林學者之一。他創立了一門全新的科學,並稱之為人類社會的科學('ilm al-ijtima' al-insani)——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社會學:一門研究社會的學科。用匈牙利的德國社會學大家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1893-1947)的話來說,社會指的是人類共同生活的不同形式,包涵社會接觸、社會距離、隔離、個體化、合作、競爭、分工、社會整合等。這些生活的形式,使人們得以在不同類型的組織與群體中聚集、生活和互動,形成社區和社會。理解社會和群體生活的本質,對於理

解社會行為和社會事件來說是很重要的。伊本赫勒敦便幫助我們釐清了這一點。.

為了指出理解社會的本質,對於區辨歷史中的事實與虛構有多重要,赫勒敦以摩洛哥伊德里斯王朝(Idrisid dynasty)的統治者——伊德里斯(Idris bin Idris,803-828)的後代舉例說明。有些傳聞表示,這位君主的兒子,其實是他的母親和一個客人Rashid的外遇關係中所生。事實上,伊德里斯是嫁入柏柏(Berber)部落,並和族人一起生活在沙漠中的;在赫勒敦的社會學觀點中,從沙漠民族的本質來看,婚外情不可能在其他人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如果我們對沙漠遊牧民族的社會有所了解、知道他們如何互動,並了解他們的社會條件,我們便能得出伊德里斯的兒子不太可能是婚外關係的產物。

綜上所述,社會學的主旨是理解社會的本質、釐清社會因素如何在社區、社會和文明發展中運作。為了解釋人類的相互作用、合作和交往,社會學的觀點往往離開了學術界。它們被政治家採納和擴展,並影響了世界各國的政策制定。

> 拉惹勒南、雷根與伊本赫勒敦

曾擔任新加坡外交部長(1965-1980)和副總理(1980-1985)的拉惹勒南(S.Rajaratnam,1915-2006),便以伊本赫勒敦的觀點來思考新加坡21世紀的未來。

在1979年12月的一次演講¹中,他探討了一個社會如何獲得並駕馭德行(virtu),在馬基維利的道德品質觀點中,德行指的是使人能掌控局面的特質,如尊嚴、勇氣、技巧、強硬和無情等等。唯有透過德行,一個社會才能處理與其未來息息相關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與科技力量;若是面對這些力量而不採取行動,將會導致社會的觀點逐漸成形,也讓他得以反思伊斯蘭文明的崛起和衰落。在他的朋友——社會學家 Syed Hussein Alatas 的建議下,他閱讀了伊本赫勒敦的《歷史緒論(Al-Muqaddimah)》,其介紹了阿拉伯人、柏柏語族和其他民族的歷史。

拉惹勒南認為伊本赫勒敦的核心概念「'asabiyya」,指出在部落、村莊和拓荒者聚落中的群體團結感,是游牧社會與城市居民相比更具彈性、堅韌、勇敢、自力更生能力的原因。正是asabiyya的紐帶使這些游牧民族得以征服城市、形成新的王朝。拉惹勒南認為,伊本赫勒敦所提到的'asabiyya,其實就是馬基雅維利的「德行」概念。

在拉惹勒南的演講約兩年後,美國總統雷根 (Ronald Reagan)引用了伊本赫勒敦的名言: 「王朝初期,小額徵稅便能取得大量收入;在王朝末期,大量課稅卻只能產生少量收入。這是因為王朝受到宗教法條的規定,只能徵收慈善稅、 地稅、人頭稅等稅目。」

雷根總統將伊本赫勒敦列為供應學派經濟理論較早的支持者,並基於此理論設定許多政策。根據這個理論,降低稅率將會刺激經濟、產生更多的稅收收入。雷根更引用了伊本赫勒敦的說法,表明:「我們正嘗試走向小額稅目評估與巨額稅務收入的方式。」²

對伊本赫勒敦來說,'asabiyya的衰弱以及 統治階級對於財富的追求,會導致更高的稅率。 隨著統治精英發展出更繁雜、更奢侈的生活形 式,預計收取的稅務自然要增加。這最終會導致 生產活動減少或停止,並使稅收收入減少,形成 生產和財政周期的下降,最後促使王朝走向滅 亡。拉惹勒南也對此問題有所研究。他認為面對 21世紀的來臨,新加坡需要透過馬基維利的德 行,或是伊本赫勒敦所說的 'asabiyya'才得以 在世界反覆無常的力量之下倖存。

> 涂爾幹與自殺的研究

心理學是一門關於心智與個體良知的科學,而社會學則將集體良知作為一種社會事實進行研究。集體良知使社會得以構成,包涵了一般人的共同道德、宗教、集體信仰、情感等等。相較於心理學的解釋是從特定個體出發,社會學的解釋旨於從群體特質理解群體中的事件原因。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1917)是現代社會學學科的創始人之一,致力於將社會學劃定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並藉由對自殺的研究來顯示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差異。

涂爾幹之所以研究自殺,不只是因為這樣的 社會現象很重要,也是為了向學術界證明,在面 對一個似乎用心理學就足以解釋的個人行為上, 社會學也可以發揮特定的作用。

涂爾幹試圖解釋不同群體之間自殺率的差 異如何出現。他認為,假設生物和心理因素在不 同群體之間保持不變,那不同群體間自殺率的差 異很可能是由社會因素導致,而非生物和心理因 素差異。藉由其他因素的排除,他得以透過實證 法來檢驗理論,例如因為同一種族中不同群體的 自殺率有所差異,而排除了種族的因素。

涂爾幹藉由一個社會或群體的整合程度和 規範程度等社會事實,來解釋不同民族自殺率的 不同。整合和規範的差異,會導致四種類型的自 殺:利己型自殺、利他型自殺、失序型自殺和宿命 型自殺。

讓我們以其中兩種自殺為例。利己型自殺的發生,是因為個體沒有很好地融入群體。如果集體良知薄弱,而放任人們能恣意地追求個人利益,這種不受限制的利己主義就會導致個人的不滿。並不是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滿足,而就算需求被滿足,也會有更多的需求形成,而最終產生不滿;甚至會導致一些人自殺。如果個體生活在一個緊密結合的群體中,如家庭或宗教團體,這些群體將會提供強大的集體良知並阻止自殺的發生。

利他型自殺則發生在社會整合過於強烈的時候。1978年,吉米瓊斯牧師的追隨者,集體在

蓋亞那的瓊斯鎮自殺,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牧師的信徒們心甘情願地為他喝下毒藥,並將毒藥分給自己的孩子。身為這個緊密且團結的社會中構成群體的一份子,他們被說服或被迫接受自殺,同時相信這是他們的責任。

如前所述,社會學是關於社會的學科,其關注人類之間的互動、合作和連結,以及社會因素如何在他們的發展中發揮作用。在保持社交距離的議題上,這又能為我們提供什麼見解呢?

> 這真的是保持社交距離嗎?

在COVID-19疫情肆虐期間,「保持社交距離」這個詞逐漸為人所知。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保持距離指的是「和他人之間至少保持1公尺的距離。」,許多人將其稱為社交隔離,也就是在公共空間的人與人之間保持物理空間,避免聚眾行為與大型聚會。

社交隔離實際指的是物理上的隔離。許多對於社交隔離的定義的確也被以物理性隔離來認知,這造成了一種錯誤的印象,把社會的(social)與物理的(physical)概念混為一談。

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是一個社會學中很重要的概念。在公共衛生領域,這是一個較為新穎的詞彙,但在社會學理,這個詞可以回溯到二戰時期之前。雖然當時這個詞的涵義並非是物理或空間上的距離,也並不代表社會距離與物理距離這兩種意義無法同時存在。

社會距離指的是缺乏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程度,而物理上的距離並不影響這點。有初級的社會接觸,也有次級的社會接觸;初級的社會接觸有著頻率較高、更親密的交往,例如初級團體中面對面、直接的視覺和聽覺接觸,像是家庭成員、同事、朋友等。社會接觸也可以是

次級的,例如和不屬於自身群體的人之間,頻率 與親密度較低的交往。不管在哪種情況中,社會 接觸考量的都是個體之間的社會關係與社會親 近性,而不考慮物理上的接近程度。

兩個人之間可能在物理上距離很遙遠,卻在社交上很親近,具有社會接觸。一對因為COVID-19疫情的旅遊限制,而被分隔於兩國的情侶,卻透過社群媒體聯絡對方,這並不是「保持社交距離」。即便在物理上分隔,他們也具有親密的社會接觸。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物理上很接近卻沒有社會接觸也是有可能的。舉兩個過斑馬線的人為例,雖然他們物理上很接近,兩人之間卻可能是陌生人的關係。他們的行為舉止並不是以對方為對象,兩人之間也沒有社會接觸。再舉一個在雜貨店購買商品的例子,即便物理上很接近,社會接觸卻是轉瞬即逝。

在這樣的疫情時期,我們應該要鼓勵的是物理隔離,而不是保持社交距離。能夠限制病毒傳播的,也只有物理上的隔離。由於物理隔離導致近距離社交行為難以進行,我們更應該提倡其他形式的社會接觸,而非鼓勵保持社交距離。

我們需要應當開始思考,並釐清自己想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我們應該針對物理隔離與社會接觸進行反思,並進一步討論在保持物理分隔的狀態下,該如何強化與他人的社會連結。■

來信寄至:

Syed Farid Alatas <alatas@nus.edu.sg>

1.「拉惹勒南的今昔展望」、《海峽時報》("Raja takes a look at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Straits Times*),12月21日,1979年。
2. Robert D. McFadden,「雷根引用伊斯蘭學者」、《紐約時報》("Reagan cites Islamic scholar," *The New York Times*),10月2日,1981。

> 現代印度社會學的先驅

Mir Suheel Rasool,印度喀什米爾大學



Yogendra Singh, 2018°

Yogendra Singh(1932-2020)是印度後殖民時期的知名社會學家。Singh是知識圈和學術圈的重要人物,在印度社會學界,Singh針對社會階層、社會變遷/延續性、印度社會學、現代化和文化變遷等領域的工作,都具有開創性的成果。他的書寫涵蓋了多元的主題和觀點,卻總是能對不同主題抱持相同程度的關注,自在地在各個研究主題之間穿梭。

Singh教授率先研究和剖析了印度社會的現代性和傳統。他的多數研究都和現代性、傳統和社會階層有關。他使用綜合的研究方法來理解並分析印度社會。他在1973年備受矚目的巨作《印度傳統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Indian Tradition)》為印度社會學開啟了新的視野。他還參與十本專刊和書籍的製作,包括

《人類的形象(The Image of Man)》(1983)、《印度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Ideology and Theory in Indian Sociology)》(2004),以及主編了《社會科學:傳播、人類學與社會學(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2010)的部分系列,在這些著作中他針對資訊理論和社會學的相互作用,詳細討論了符號和傳播的意義。

Singh教授有堅定的信念,鼓勵異議,並 善用公開對話作為社會學論述的方法。即便在 當前疫情期間,他的關懷重點仍然是社會學典 範的改革,希望藉此解構後工業社會出現的危 機。Singh骨子裡是個不折不扣的現實主義者, 並相信理論的經驗基礎,這就是為什麼他經常 被稱為「社會科學家」、超越了狹隘、紀律分明 的學科分類。他在《社會學公報(Sociological Bulletin)》的一篇文章中,強調了「知識的社會學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重要性, 呼籲客觀性和現實主義。他號召印度社會學與國 際的「參考模型(reference model)」脫鉤,並做 出一份銳利又精準的目錄,細數社會學所面臨的 新挑戰。他強調田野研究的重要性,因為田野研 究能夠顯示並記錄「社會空間(social space)」 的客觀存在和歷史特徵。他深信知識和科學的民 主化。他發展出一個綜合模型來研究印度社會的 結構和文化面向。他認為每當研究一個特定的空 間脈絡時,都需要發展出一種特定的研究方法。 在一次採訪中,他描述了右翼民族主義的崛起與 中產階級焦慮的興起是一致的,並提出面對這種 極端民族主義政治的「明顯威脅(accentuating threat)」時,追求教育進步才是解方。

Yogendra Singh描繪了印度社會學如何圍繞「村落研究(village studies)」的主題發展自己的論述,並在1950年至1980年面臨概念本土化的困境。當時的主流社會學,除了以美國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為根基外,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materialist)式的觀點興起,在那

幾年也相當具有代表性;而上述兩項發展對於形塑印度社會學都十分重要。Singh相信印度社會學具有進一步適應和改變的內在潛能,包含以下兩種方向的爭議:定義、重塑全球社會學的通用論述,以及與印度的歷史性、文化特殊性、社會和經濟發展目標同步的概念本土化。他的觀點啟發了我們去描寫印度社會學獨特的論述,貢獻遠不只是引入西方社會學的概念而已。

Singh教授一生中曾是多個著名組織和機構的成員。他是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JNU)社會科學院社會系統研究中心的主要設計者和創辦人之一。由於他謙虛的個性和知識上的誠實,他在爬上學術等級頂端的過程中從未表現出過度野心。他很少關心學術界的政治,所關心的大多與學術有關,這也反映在他在整個學術生涯裡勞累地貢獻的書寫當中。除了在印度各個機構中教授社會學、設計社會學課程綱要之外,他還向許多學生和研究者傳達了理解社會的理性、激進途徑。晚年的他依然充滿能量與活力,孜孜不倦地進行著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Singh教授的思考和寫作方式對當代社會學和印度社會產生了長遠影響。他十分清楚自己的研究方法,且不相信模糊的思路。他堅信要研究真正影響個體行為和態度的社會事實和社會生活,同時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徹底改變的社會。他針對影響印度社會最本質的問題進行深入且透徹的研究。他的許多著作時至今日還可以對應到當代世界,且和他最初完稿時一樣實用。

隨著他的離世,印度失去了一位有遠見的社會學家,他在印度社會學重新定位和現代化上的貢獻和努力永遠都不會被忽視。從培養研究精神,到深入鑽研社會議題、進行分析性研究,Singh 教授留給後世的貢獻,於學生的心智中刻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記。我們會永遠記得他是一位社會學家、老師、哲學家,更是一位在知識節操上無可挑剔的人。■

來信寄至:

Mir Suheel Rasool <mirsuhailscholar@gmail.com>

> 論重新整合基進觀 點的急迫性

S.A. Hamed Hosseini,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



要發展改革性的反抗,我們需要尋求行動主義 和改革性學術的整合。 由Hamed Hosseini 設計。

OVID-19危機已經告訴我們,基進的轉型以避免更大的內爆是無可避免的。經歷遲緩成長或去成長的階段,也就是集體的共在其重要性勝過於享樂主義,讓我們警醒到要回到過去那種發展主義的模式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必須將資本主義神話中「沒有資本主義外的替代方案」這種致命的認知病毒隔離起來。痛苦的封鎖經驗讓我們反思我們身處的位置、我們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以及我們如何結合創意的想像和政治行動來形塑後疫情世界。

> 我們身處在哪裡?

身處在封閉的囚室,缺乏以全球為尺度的基進且廣泛的行動,人類正前往文明崩解之路。崩解的過程像是一連串相互關聯的災難:地區性的氣候災難、全球系流行病、經濟衰退、嚴重的食物、水和能源危機導致的大量移居人口和不安、全球性的衝突及內戰、更嚴重的氣候災難以及物種多樣性的加速消失。

> 我們如何到達這個地步的?

簡而言之,一種源自歐洲殖民主義與現代資本主義相互交織的文明型態在過去數十年間在世界獲得主要地位。這種遍於世界的文明體系根基於: (1)資本取代勞動力成為最終價值(2)炭-石油或一般來說叫做榨取主義(3)經由持續不斷的商品化社會-生態關係以及幾世紀來不斷占用共有財和推行消費文化來達成經濟成長。(4)殖民性,經由不斷階層化權力關係和維持相互聯繫階序和階級的知識型。(5)貪腐政治,經由金融壟斷的資本、利益導向的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監控人民、使用大數據、生物或神經方面的科技和戰爭。我將上述五點稱為五個內在特徵(5Cs)。

五個內在特徵對於地球的資源所需無度,這個特質讓文明自身極易陷入危機。既然我們早已

超越地球的生物承載力,而目前也沒有科技能解決這件事,因此我們可以說使現代文明進步的特質同時也造成他的殞滅。

> 減碳並不足夠

如果只針對上述五個內在特徵其中之一做改善,而不做全面檢討改善,改革將不會成功。以許多進步派組織提倡的減碳為例,目前這個最受歡迎的解決之道面臨的問題是,科技本身受到嚴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層面的阻礙,進步的幅度太慢了以至於難以拯救地球。更重要的是,這些改善能源問題的科技背部被的統治階級視為擴增資本霸權的手段。

而所謂的後碳政策(post-carbon policies) 其實使我們更加仰賴上述五個特徵。科技革命的 立基於特定的社會經濟和生命政治結構,同時也 生產他們,這些結構面的問題必須被挑戰,才能 有意義的轉換到下個能源的使用階段。這些必須 執行的措施不只減碳,還有去資本化、去發展主 義、去殖民化並深化民主機制(五項措施以下簡 稱5Ds),換句話說便是克服上述五個內在特徵。 因此如果將減碳視為適切的解決方案,他可以扮 演與其他五個同等重要解決方案的首要目標。

> 我們作為學術倡議者能做甚麼?

面對全球危機最化約式的方式就是最近政治科技官僚的復興。這樣的科技官僚每次的失敗就越增加其集權的力量。大學原本作為創新與新一波知識的發源地,正逐漸因為在經濟緊縮時期大企業與商業夥伴成為大學主要資金來源而失去自主性。人力資源與社會科學(HASS)正面臨認同危機,他需要找出自己的論述來重新找為他自己過去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一個「基進改造性的獎學金」方案必須被設置來執行進步的替代方案(如同由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ransformative Global Studies的作者所做的那樣)。

為了回應沒有效率的科技官僚,我們已經看到許多自發的創意和草根性的計劃來推動各種形式的系統性的過渡方案。許多人已經了解到致力於歷史上文明層次的必要性,這種轉變已經被許多推動5Ds運動的人認識到。

2020後十年年可被視為人類歷史上最關鍵的時間,其中"要求不可能達成的事"成為新興革命力量的唯一"現實"選擇。當前以經濟和生態危機加劇為特徵的局面,很可能轉化為前所未有的不滿。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已經處於一種狀態,即如果不從現場的的激進力量獲得洞察力,就無法解決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斷裂。

然而,這些力量是多樣的,無組織且發展迅速,因此很難理解。 直到最近,由於新冠肺炎帶來的封鎖和經濟放緩,這些變革性力量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透過線上互動來與大廣大的群體互動。 儘管5D的概念有助於解放當前困境的潛力,但遺憾的是,它仍然是HASS的邊緣議題。

> 共同開創知識共享的必要性

在進行上述5D的行動時時,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共同發展"一種動態的且能包含原本行動目標的知識。這些知識可以培力這些改革行動者。沒有理由相信危機的加劇會自動導致全球左翼中那些毫無貢獻的分支崩潰。期望從5D的相互互動中會偶然地在市場形成一個新的典範並神奇地結束資本主義,這樣的幻想和新古典經濟學相信的「看不見的手」和「涓滴理論」一樣諷刺。

當前的情況是,由於傾向資本的行動本身損害了共同體的利益,權利和需求,因此在政治和經濟上所做的努力、對於與建設的可持續性、自給自足、公正、民主的未來並抵制和逆轉資本家所建立出的知識,這些都至關重要。在不屈服於HASS的技術官僚思想的前提下,可以運用社會資訊學的最新方法論來自我培力,以將自己由資本主義打造的知識中解放出來。也可以利用大數據的力量和草根運動共同創造「知識共享」,以給予5C後的生態文明發展方向。■

來信寄至:

Hamed Hosseini < hamed.hosseini@newcastle.edu.au >

>「Koyaanisqatsi」之後: 文明的再想像

Barry Gills,芬蘭赫爾辛基大學



在文明中的主要權力和社會組織模式,必須在未來被深刻的重新設想和改變。

當前的危機中,有一種新穎的觀點在全球蔓延的討論中引發熱議,其認為現代形式的世界秩序和文明,導致人類及自然陷入了重大的危機,而我們應該要徹底地改變世界的構成。氣候(Climate)、資本主義(Capitalism)與疫情(COVID-19)這三個「C」,也就是所謂的「三重危機」,促使人們嘗試找出這些危機的根本原因。

> 生活在 Koyaanisqatsi 的時代

北美的霍皮族人有個神話和我們的現代情境非常有關:那就是「Koyaanisqatsi」,通常被譯為「失衡的生活(life out of balance)」、「一種不應該存在的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 that should not exist)」、「瘋狂的生活(a crazy life)」。在這個神話中,人類是所有生命的守護者,其存在目的是要永久地維持各種形式生命之間的平衡。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自身的生活形式,

應該要能與其他形式的生命保持和諧。然而在 Koyaanisqatsi中,人類已經失去了理智,並在 自身的行動下,漫無目的地奔向毀滅的境地。在 此形式下,文化視生命之間基本的連結為無物, 並將生命的神聖性與初衷拋諸腦後,遺忘了人類 與其他生命形式之間深刻的相互依存關係。這 種文化的行為是毫無人性(mindless)且毀滅性 的。唯有深沈的精神覺醒,甚或是文化與物質上 的重構,才能夠轉變這樣的文化進程、拯救文化 本身,並將其他形式的生命從 Koyaanisqatsi 注 定帶來的危害中拯救。

我們正生活在一個 Koyaanisqatsi 的時代。「進步」、「現代」、「發展」、「全球化」這些概念,就像咒語一般地操控了我們,讓我們以為美好的未來終將來到,使我們深刻地相信,世界將迎來物質的豐饒、未來時代的健康、安全、自由。然而事實是,這些概念將那些導致現代全球危機的歷史過程,偽裝成美好的樣貌。

有關於人類「文明的衰敗」與「存在危機或挑 戰」的研究,如今在學術上已逐漸獲得正當性, 甚至受到歡迎。這樣的現象,也顯示我們已經意 識到,自己正活在主流文明的某種「大崩毀」、「 世界體系危機」或「普遍危機」之中。導致這種「 普遍危機」或「大衰敗」的眾多原因,甚至可能導 致主流文明形式的崩壞。氣候變遷不是唯一一 個促成此種危機的因素,從許多角度來說,氣候 變遷本身就是更加根本的長期歷史進程所帶來 的後果。引發這場危機的歷史進程,包含:寡頭化 (oligarchization),也就是財富的過度集中; 對勞動和自然的剝削、過度從人類勞動和自然界 中提取價值以增加系統熵;資本與財富剩餘的附 加性和競爭性累積,以及其所導致的社會基礎建 設不足;對商品化、市場化和經濟成長的系統性 邏輯與洣信。

主流的經濟學不管在學術或實際運作上,都存在著一種錯覺,認為經濟最終並不會遭遇生物在物理上的極限。在主流經濟學之中,環境或環境經濟學,都只是個次要的次領域;他們認為現在的主流經濟體系造成的所有環境問題,在未來都能透過科技創新、市場原則與機制解決。這種狹隘且盲目的世界觀已經存在了數十年,使得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政治行動者,在面對需要積極處理的氣候變遷與生態災害問題時,不斷地重現自滿與拖延的心態。對於世界過度樂觀的認知,和對於「市場」的崇拜,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主流信仰,也構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等霸權思想的核心,並在全球受到理解與實踐。

危機意味著崩潰,也意味著系統性的失敗。 現代世界的危機,反映出整體人類的存有危機——這個理應受全球化影響,取得前所未有成功的文明,將迎來衰落甚至崩毀。

> Koyaanisqatsi 同為解方

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Koyaanisqatsi便是答案。我們需要針對文明、精神與物質文化進行深度的修復——我在2020年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期刊上投稿的文章中,詳細地解釋了這個概念。我們需要「重新想像」我們的文明,因為在其中構成權力與社會組織樣本的,是國家、資本、都市等基本形式;我們必須要在未來重新想像,並從根本上改變它們。人類必須認知到自己鑲嵌在生命之網中,並充分理解現實的樣貌:星球邊界、地球系統動力學、生物物理基礎、生物物理極限、生態與氣候變遷臨界值——人類事實上是身在一個具有統一性的生命系統之中。

在未來的進程中,除了深度復原地球上的生命,並重建其龐大且美好的多樣性,也要翻轉至今主宰了集體物質生活的、對於商品化、市場化和經濟增長的迷信。在物質和社會層面上重建這個世界,將會是把文明從本質上重構的關鍵。國家內部與全球的和平,將成為文明復興與再想像的基本要素。充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種族主義和父權力量的黑暗時代,已經持續了好幾個世紀,現在也該結束了。

歷史尚未成定局,但未來將取決於現在。當前全球系統性危機下出現的新世界觀,其實和一種非常古老的世界觀有所相似。要回復COVID-19疫情時代來臨前的「正常」,不過是個不切實際的幻想;期待著商業能夠回歸以往,更是一個災難性的想法。只有徹底改變我們文明的基本形式,才能避免未來的災難。這樣的改革行動正是實現於多數人身上;不僅由多數人執行,更是為了多數人而實踐。這也是關乎人類集體生存的唯一現實前景和希望之源。如今,我們不能再有任何的藉口、也不能再走回頭路。■

來信寄至:

Barry Gills

bkeithgills@gmail.com>

> 拉斯塔法里運動及 西印度的再發明

Scott Timcke 和 Shelene Gomes,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聖奧古斯丁的西印度群島大學以及ISA移民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31)成員



2009年於衣索比亞沙沙馬的一個告示牌·暗指塔法里的存在。 來源:Shelene Gomes。

1 930年拉斯·塔法裡·梅科嫩(Ras Tafari Mekonnen)加冕為海爾·塞拉西一世 (Haile Selassie I)皇帝·如電影般慶祝 著衣索比亞生活的新紀元。 在加勒比海12500公里以外,在英國統治下可憐的牙買加黑人正看著這壯觀的新聞片段。他們第一次見到黑人皇帝。

文獻記載著當牙買加人在由報紙和雜誌得知這項消息後,竭盡所能地開始了解衣索比亞。Marcus Garvey在他的戲劇非洲國王與皇后的加冕中捕捉了這個強而有力的象徵。牙買加人滿懷希望的眼神是對於恐怖的種族資本主義的回應。

> 一個反文化的現代性

從黑人經驗出發的資本主義史是一個十分 不同於我們所熟悉的資本主義史。雖並不完整且 並非毫無問題,拉斯塔法里運動(Rastafarians)的確是Paul Gilroy所謂的反文化現代性。千里達群島出生的C.L.R. James和Claudia Jones反轉了正統上對於現代性的分析,將西印度群島置於歐洲資本主義發展的核心。拉斯塔法里運動同樣地也是標誌性的運動,他以通俗的概念來處理奴隸解放的計畫。這樣的思考反轉了一種由上而下、由國家或體制所發動的社會改革才是最恰當的概念。

確實,拉斯塔法裡的世界觀是一個說明受壓制的主體如何設想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例子,並從中奮鬥。因此,長期以來影響著加勒比海民族學與社會理論的拉斯塔法裡運動和以加勒比海本位為基礎的改造,能夠在這個世紀幫助發展解殖社會學。

> 解殖社會學的元素

讓我們從人民的社會運動開始,來展示學 科的限制是可以被鬆動的。從2008到2015年 我們將多個關於後殖民西印度的社會理論家 的田野資料彙整起來,我們從中了解到拉斯塔法裡靈性的實踐是有機知識分子嘗試提供他們每日生活處境一種社會學解釋的產物。拉斯塔法裡運動的核心構成中,「全球政治」(cosmopolitics)的概念提供了他們社會世界中豐富的描述,如同Rodney將拉斯塔法裡運動是為他立足於後殖民牙買加寫作的基礎。

二十世紀後半葉,拉斯塔法裡運動的成員一波波的從加勒比海移往衣索比亞的莎莎曼城(Shashamane)。定居在由海爾·塞拉西一世專門為離散非洲人劃定的土地,莎莎曼城組成的共同體代表著潛在的泛非洲社會的政治主張與想像,而且可能成為真正的實踐。衣索比亞與是許多拉斯塔法裡運動成員指涉人類起源和錫安聖地的地方。因此,到莎莎曼城定居又被稱為一種回歸,這樣的行動標誌著自我改造和以他們喜愛的方式進行社會改革。

有鑑於這個神聖的地點,支持拉斯塔法裡運動的人不斷到莎莎曼城朝聖,並在經濟上支持了當地社區。這種支持對於伊索匹亞拉斯塔法裡運動的價值觀的維繫和再生產、社會進步和宗教社群的認同格外重要。拉斯塔法裡運動帶給其信徒尊嚴以及這個運動與神性的連結是一連串恐怖的長期殖民宰制的後果。這種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連結的觀點並不由殖民帝國的中心長出的,而是由拉斯塔法裡運動的成員所發展出的。

> 拉斯塔法裡運動的「世界政治」

拉斯塔法裡(Rastafari)不僅認為伊索比亞是基督的堡壘,而且他們欣賞伊索比亞是唯一從未被歐洲大國正式殖民的非洲領土。拉斯塔法裡運動是建立在一種理想化的非洲作為思想抵抗的基礎,開始相信海爾·塞拉西一世皇帝是神聖的。這種信仰的背景來自加勒比海人民對聖經的熟悉。當然,拉斯塔法裡教主義也是從奴隸貿易

中僥倖存活者產生的宗教活動產物。但是,隨著二十世紀初整個牙買加的宗教組織開辦學校,聖經也逐漸為普通百姓所熟知。

就是經由教義的重新詮釋而非世俗組織的動員,共同地抗白人至上的運動才可能成形。從這些再詮釋中,我們找到拉斯塔法裡教將在加勒 比海支持殖民壓迫的基督教實踐給去殖民化。

在這個框架中,拉斯塔法裡教擁抱了一種 共同的人性,接納了那些信教者與異教徒。這樣 的回應可以被解釋為,我們看到一種形成中的 南方世界政治,堅持開放與多元的態度。拉斯塔 法裡的開放性根植於對於加勒比海社會性的歷 史意識,包含跨洲的種植園經濟的歷史、階級和 多元文化的環境,並從社會互動中形成自我認 識。就是這些直接挑戰了白人至上的概念。

拉斯塔法裡絕不是第一個表達泛非主義的,Paul Gilroy,Hilary Beckles和 Robert A. Hill都展現了這方面的努力。儘管如此,拉斯塔法裡運動的日常實踐有助於理解「日常團結」這個概念的經驗和概念的探求。日常團結提供了進一步思索由南方世界主義的框架來進行社會學的想像,這些想像根植於黑人經驗。

作為日常團結的一個例子,拉斯塔法裡的世界政治概念幫助社會學者強調在地情境其實與世界密切相關。經由這些曲徑提供的豐富描述,我們能開創一種基於黑人經驗的社會學,他的特質是去中心、去殖民,並將二十一世紀不斷出現的不平等給概念化。經由這樣的方式,具有解放潛能、接地氣的西印度社會理論才能持續下去。■

來信寄至: Scott Timcke<u><stimcke@gmail.com></u> Shelene Gomes <sshelene.gomes@sta.uwi.edu>

> 全球和在地脈絡下的 斯里蘭卡社會學

Siri Hettige,斯里蘭卡可倫坡大學,ISA教育社會學委員會(RC04)、貧窮、社會福利與社會政策委員會(RC19)、青年社會學委員會(RC34)研究員



1921年的錫蘭大學學院。 來源:創用CC。

們都知道,許多非 西方社會從16世紀 ┛初開始陸續受西方 殖民統治。斯里蘭卡,舊稱錫 蘭,是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島,從 1505年到1948年脫離英國獨 立為止,陸續由三個殖民勢力 掌控,分別是葡萄牙、荷蘭和 英國。斯里蘭卡在殖民主義下 經歷了大幅的轉型,特別是在 英國統治的150年期間。所有 轉變中,最值得討論的是教育 環境的變化,從由宗教機構主 導的初級教育體系,轉變為更 多樣化的通識教育體系。然而, 現代大學教育體系是直到殖民

統治將近結束才引入的,使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本土傑出青年勢必要出國接受這類教育。因此,在斯里蘭卡成功向上流動的在地人沒有機會獲得多元領域(如社會學)的大學教育,而社會學卻早已是許多歐洲和其他地區大學廣泛教授的學科了。

> 大學教育的擴張

由於大學教育很大程度上 是後殖民時期發展而成,社會 學教學不得不等到1940年代 本土大學建立後,方能開始實 施。隨著接下來大學教育需求的增加,幾所新的大學又在後續的幾十年中陸續建立。然而,社會學教學仍然局限於佩拉德尼亞大學,直到1969年,也就是獨立後的二十多年,第二個社會學系才在可倫坡成立。

重要的是,隨著佩拉迪尼亞大學的成立,社會學系也在甫被任命的系主任安排下設立,這是在1950年代初期。它最初由美國社會學家BryceRyan教授主持。由於教學所使用的語言是英文,因此可以使用英文的、在西方國家和其他

1950年代中期,可倫坡郊區的兩個主要佛教寺院,變成兩個主要佛教寺院,這導致了許國立大學,這導致了哲學教育的大學教育的大學教育的是國家主導、公部門促成的實張發展計畫下,從1950年代開始,這個趨勢持續了幾日,這個趨勢持續了幾同大學紛紛在國內下垂至,會理,創造了更多接受高會會人。這種大學教育的穩定擴張便等致畢業生的失業率很高。

> 孤島的社會學

隨著時間的推移,從英語 到母語的轉變使多半只使用單 語言的學生失去了使用英語文 本的能力。儘管後來做出了某 些制度性安排,將一些關鍵的 社會學文本翻譯成母語並出 版,但資源和其他限制阻礙了 這個做法,使其無法持續進行。 因此,多數學生大幅地被侷限 於只能使用本土語言的課程講

義。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大多 數學生愈來愈與其他地區廣泛 使用的原始社會學文本疏離。 然而,無論他們受到的訓練品 質為何,大多數社會學畢業生 都能被國家機構雇用,承擔多 種職務。儘管有一些學者經由 研究生培訓和交流訪問與國外 大學保持聯繫,其他人持續與 國際學術交流保持脫節,不參 加學術研討會、不在通用的學 術期刊上發表論文。上述趨勢 至今依然持續存在。在第一位 錫蘭裔的大學社會學教授Ralf Peiris領導下,於1980年代成立 的國家社會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依 然活躍,但只吸引一些本土大 學的少數學者參與。此外,很少 有斯里蘭卡社會學家曾經是國 際社會學協會(ISA)的成員。然 而,他們仍然勤於教學、針對當 地問題進行研究,並為當地出 版的期刊做出貢獻,而來自本 土大學的畢業生也經常能找到 政府的工作。

從上述可以明顯看出,在 後殖民的斯里蘭卡,帶有反殖 民民民族主義(anti-colonial nationalism)色彩的政治經 濟學,促進了飛地式社會學教 學和研究的延續,且儘管私人 教育的全球化使許多公共教育 體系之外的人都能找到其他形 式的教育和職業發展選項,斯 里蘭卡社會學依然使自身獨 立於北半球和南半球其他地 方的學術圈之外。而正是公共 教育體系之外、通常條件和背 景也更好的人,仍然通過超越 國家疆界的私人教育系統與 外界保持聯繫。然而,這些人

大多傾向於在理工科(STEM education)發展,而不是包含 社會學在內的文科領域。

殖民統治期間和之後的 變化明顯形塑了斯里蘭卡社 會學的發展。這與古典和折 代社會理論家對社會學知識 的學術論述非常吻合,諸如 Karl Marx (1844)Max Weber (1947)Max Scheler (1960)Wilhelm Dilthey (1958)Mannheim (1936)Karl Norbert Elias (1956)Robert Merton (1957)以及 Peter Berger 和 Thomas Luckmann (1966)等。國內不 斷發展的社會文化脈絡,決定 了這段時間知識生產和傳播的 過程。現階段國際社會學與斯 里蘭卡社會學之間微弱的關 係,反映了斯里蘭卡社會學家 在他們特定的社會文化和體制 條件下發展其工作時,所面對 的條件限制。■

> 來信寄至: Siri Hettige <<u>hettigesiri@gmail.</u> <u>com</u>>

> 斯里蘭卡社會學 ——歷史的回顧

Subhangi M.K. Herath,斯里蘭卡可倫坡大學

里蘭卡社會學的發 展顯然沒有遵循一 套鮮明的社會學傳 統,與歐洲或美洲的做法截然 不同。它是社會學和人類學的 高度融合,並顯著地向人類學 的方向傾斜。兩個成因十分明 顯:其一是斯里蘭卡過去作為 英國殖民地,其大學教育由英 國的教育工作者建立,遵循了 英國大學體系中,人類學在社 會科學領域蓬勃發展的模式。 另一則是斯里蘭卡過去就是 傳教士和旅客感興趣的中心, 並提供獨特的美景、歷史和社 會制度;對任何有人類學視野 的學者而言,斯里蘭卡的社會 和文化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實 驗室。

然而,社會學被視為大 學內的一門學科進行教學,始 於1947年的佩拉德尼亞大學 (斯里蘭卡第一所完善的寄 宿大學),一些英國和歐洲頂 尖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教 學和研究,為斯里蘭卡社會學 (和/或人類學)的發展做出 重大貢獻。有些著名的第一代 或第二代學者仍然活躍,並大 幅地充實了這個領域,產出非 常有價值的社會學著作。他們 當中的一些人依然是主流人 類學家;跨越社會學和人類學 之間的界限似乎仍是斯里蘭 卡社會學的顯著特徵。

>「斯里蘭卡的社會學」的演進

在過去六七十年出現的 許多社會學研究都是採本地 研究的形式,不管是進行宏觀 社會學的理論辯論,還是訴諸 微觀研究,抑或是用Robert Merton (1968)的術語 來說,處於「中層理論 (middle-range theories) \(\) 的範圍。許多早期或第二代的 社會學家非常有意識地使自 己的工作以現有的國際社會 學理論體系為依歸,並在理論 層面上進行了應用、驗證和質 疑,為「斯里蘭卡的社會學」做 出顯著的貢獻。無論是曾在佩 拉德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服務的 Edmund Leach(1961),對 當時關於「經濟的超級結構性 支配地位(super structural dominance of economy) \(\) 的論辯,或是Tissa Fernando(1972)以 Pareto提出的「菁 Vilfredo 英轉型(transformation elites) 框架,針對1971 年斯里蘭卡武裝青年革命 的研究,又或者是Laksiri Javasuriya(2000)對新自由 主義和福利政策的貢獻等等, 都落入一個濃厚理論性工作的 斯里蘭卡社會學傳統。檢視日 後斯里蘭卡社會學家所做的貢 獻,會發現很多學者的關注焦 點,都是關於如何改變斯里蘭

卡的社會現象,例如種姓和階級、土地關係、政治制度、性別關係、宗教和文化,以及移民和家庭網絡。近年來,學界轉而關注新興或普遍對個人、社會與不同社會團體產生嚴重影響的社會議題。在過去五十年中,這種社會議題本位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ocial issues)似乎已經在學術界和普遍讀者中確立了自己作為「斯里蘭卡的社會學」的地位。

>「社會議題本位的社會學」

許多落入這個「社會議 題本位的社會學」範疇的研究 成果,似乎都遵循了美國社會 學早期引入的社會學傳統, 例如W.F. Whyte的《巷口社 會(Street Corner Society)》 (1943) \Frederic Thrasher 《黑幫(The Gang) (1927) Znaniecki和W.I. Florian Thomas的《歐洲和美洲的波 蘭農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1918),上述著作都大幅促進 了對在地微觀社會議題的理論 性論述發展,而非歐洲理論社 會學或具有強大哲學基礎的20 世紀中期美國社會學。今天在 斯里蘭卡發表的社會學成果, 絕大多數奠基於廣泛的田野 調查所收集而來的質性、量化 資料,聚焦在今日斯里蘭卡社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社會問題的社會學似乎在 學術界和廣大讀者中確立了自己的『斯里蘭卡社 會學』地位。」

如今多數斯里蘭卡大學都從事社會學教學,然而其教學水準和所關注的主題,卻存在著明顯差異。社會發展過程也帶來一些影響,包括1956年官方語言政策的改變(使多數人口使用的語言:僧伽羅語,成為唯一的官方語言,不承認少數人口使用的語言:泰米爾語,以及唯一在國內被使用的國際語

言:英語)、隨後發生的嚴重人才外流,以及學校系統中的教學言從英語改為鄉土語言,從而言之新的一代喪失學習國際語言與不可之一,而這些影響依然在社會學知識的產出會學知識的產出會學和大系統性和結構性變化,以及人們為了應對這些目常現實而採取的許多策略,新興社會學工作內含的多樣性無疑是鼓舞人心的。

但是,問題來了:「可以將這種『日常生活社會學』的研究工作視為『社會學』嗎?」 Max Weber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1919)中寫到:「現今在青年圈子裡,人們普遍認為科學已經成為[...]一種只涉及冷靜智力、而非人的熱忱和靈魂的計算。」社會學不僅僅只是觀察、詮釋和評論,也和奠基於「努力工作」而出現的「思想」有關。前

> 來信寄至: Subhangi M.K. Herath <subhangi@soc.cmb.ac.lk>

> 反思和平、衝突 及暴力

Kalinga Tudor Silva,斯里蘭卡佩拉德尼亞大學



2009年戰爭的最後階段,流離失所的泰米爾 民眾從LTTE組織控制的領土,轉移到由斯 里蘭卡武裝部隊控制的領土。

里蘭卡的社會學始 於民族學和歷史學 方法,以了解當地和 國際研究人員在1960年代建 立的一個穩定且和平的社會。 這些研究試圖探究構成持久制 度的基本原理,例如親屬關係、 土地使用權、宗教和種姓。在隨 後的幾十年中,這些研究人員 幾乎措手不及,並沒有準備應 對新的現實,因為他們面對了 各種新形式的暴力社會衝突。 本文探討了1970年代斯里蘭 卡的暴力衝突的性質,以及研 究人員如何從不同的觀點著手 解決暴力衝突,在期間所遇到 的挑戰,以及我們從這些研究 中可以得到哪些教訓以促進和 平。

> 急性與慢性的暴力

自1970年代以來在斯 里蘭卡爆發的暴力有多種形 式。這些事件包括賈納塔·比 蒙納(Janatha Vimunkthi Peramuna, JVP)的反國家 政治起義。人民解放陣線是斯 里蘭卡南部的一種傾向馬克 思主義的青年叛亂運動。1971 年以及1987年至1989年對國 家對以上進行了空前的鎮壓。 還有從1983年至2009年政府 和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 (LTTE)、斯里蘭卡北部泰米 爾人武裝的分離主義運動爆發 了曠日持久的戰爭,造成雙方 都發生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1983年7月,僧伽羅的暴徒針對 泰米爾人執行了種族清洗,以 及疑似伊斯蘭恐怖組織在2019 年4月21日復活節星期日針對 遊客的恐怖攻擊。隨著暴力根 深蒂固,執法人員及反抗者的 暴力越來越嚴重,所有這些衝 突都對國家安全構成了嚴重威 脅。自1970年代以來,每次的全 國選舉中都有定期發生選舉後 暴力事件, 通常是針對落選者。 用強納森.史賓賽(Jonathan Spencer)的話說:「斯里蘭卡 的暴力行為通常是正規政治的 加劇,不完全脫離日常政治」。

這種暴力的大多數是與身 分認同有關,這是由一種穩定 身份認同(無論是種族、宗教、 階級還是種姓)的漸進式單一 思維所驅動的。身分認同的衝 突之所以需要社會學分析,不 僅是因為身分認同與前一時期 的主體身分具有某種連續性, 而且還是因為身分認同不適合 由的經濟或政治分析。有越來 越多僧伽羅佛教精英採用國族 主義政治來驅動獨立後的斯里 蘭卡國家,他們佔人口總數70 %以上。泰米爾人和穆斯林少 數群體反對這種狀態,並呼籲 應該理解身分認同、利益和集 體動員在後殖民情境的互動關 係。

> 社會學科的獨立性被破壞

這些發展也給社會學和 人類學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例 如,占主導地位的僧伽羅-佛 教思想體系試圖壓制來自內 部的任何批評。例如,被背叛 的佛教?(1992)人類學者譚比

恩提出一種矛盾的佛教教義, 明明是一種非暴力的學說,卻 被用來煽動針對泰米爾人的 暴力。這本書在斯里蘭卡被 禁,僧伽羅民族主義者的學者 在僧伽羅語中出版了許多與 之抗衡的官傳作品,不僅攻擊 了譚比恩這位來自新教、泰米 爾人背景且國際認可的斯里 蘭卡人類學家,而且還攻擊人 類學這門學科。這樣的攻擊還 指向其他學者,例如斯里蘭卡 的 Gananath Obeyesekere 'H.L · Seneviratne 'Kitsiri Malalgoda, Valentine Daniel 和 Chandra Jayawardena在 內的整整一代斯里蘭卡社會學 家,他們移居海外,並繼續從國 外進行對斯里蘭卡的批判性研 究。在牛頓·古納辛格(Newton Gunasinghe)的帶領下,只有 少數社會學家選擇繼續在內部 鬥爭。研究人員的定位常常與 國族主義霸權相衝突,這樣的 霸權從內部或外部攻擊任何反 對者。同樣,猛虎組織對泰米爾 知識分子的任何異議也採取了 激烈的回應,視他們為背叛泰 米爾族人。因此,這樣的衝突破 壞了社會學科本身,使獨立的 客觀分析變得困難,即使獨立 客觀並非完全不可能。

隨著戰爭進展,暴力更加劇了,包括安全部隊、民兵、武

裝地方幫派以及毒品走私等相互合作或衝突。戰爭在2009年結束,但暴力轉向穆斯林,這些2012到2020年的暴力行動是由好戰的佛教僧侶發起,還有2019年疑似伊斯蘭組織的在長定地區攻擊穆斯林的日經。除了肢體暴力外,還有包括則產毀損、威脅恐嚇、脅迫、使用社群處體散播仇恨以及例行為。如同許多研究者指出的,但種壞人不被懲罰的文化逐漸確立。

> 偏袒多數的政策帶來的損害

關於官方語言的國家 政策是其中一個例子。1956 年當選的親人民聯合陣線(Sinhala Mahajana Eksath Peramuna)以僧伽羅語為唯 一官方語政策,旨在改善從殖 民時代開始普通人與統治該國 的特權英語階層的差距。官方 的語言政策實際上孤立且疏離 了泰米爾人,也限制了他們進 入國家部門工作的能力。這種 以大多數人為主的政策偏見未 能使斯里蘭卡精英意識到這將 無可避免地使得用泰米爾語邊 緣化。當時,社會學正在斯里蘭 卡逐漸成為一門學科,有關語 言政策的研究主要是由支持官

方政策的僧伽羅國族主義者提出。幾年後,這項政策的弊端變得顯而易見,國家內部逐漸出現彌補使用泰米爾語的政策。但是,傷害已經發生了。

國家在教育和發展方面的政策遵循與制定官方語言相同的模式。他們顯然偏袒僧伽羅多數派,而主流的僧伽羅政黨則參與了競爭激烈的競爭,以迎合多數族群爭取政治利益。結構和文化動力經常合謀,為席捲斯里蘭卡的暴力衝突產生正當性。

至於對和平發展的影響, 任何特別的介入都不太可能成功。 這是因為獨立後的斯里蘭 卡已經建立了某種政策體繁, 並建立了內建的機制來破壞是 何想要改善根深蒂固的偏見的 政策。 儘管微小的變化有時處 產生催化性的轉變,但我們處 於一種很糟的情況,就是任都 對於少數族群讓步的政策都 被取消。這是當前和現在斯里 蘭卡社會學面臨的主要挑戰。■

> 來信寄至: Kalinga Tudor Silva <<u>kalingatudorsilva@gmail.com</u>>

> 暴力分析:

斯里蘭卡的國家構成

Farzana Haniffa,斯里蘭卡可倫坡大學

1983年七月在斯里蘭卡是許多人回想過去時的重要日子,因為它標誌著種族衝突的開端。人們認為1983年七月的暴力衝突以僧伽羅為主的南部政府與斯里蘭卡泰米爾人之間的衝突結果,以及造成泰米爾人開始向外移民和離散海外。正如PradeepJeganathan也討論過的那樣,這也是人類學學科開始對理解「暴力」產生興趣的時候。

1983年暴力事件剛發生 後,有幾本著作出版。James Manor在1984年出版的《變化 與危機》中出版了大批人類學 家的貢獻,其中許多人當年7 月正在斯里蘭卡。Gananath Obeyesekere \ Jonathan Spencer\Elizabeth Nissan和Roderick Stirrat 撰寫了小論文,都提出了重 要論點。Stanley Tambiah 兩年後也出版著作,然後是 Kapferer,之後又是 Bruce Valentine Daniel和Pradeep Jeganathan^o

>1983年的背景

聯合民族黨(UNP)自 1977年以來都是執政黨,並於 1978年引入經濟自由化。在 1977年選舉後不久聯合民族 黨的威權統治便已十分明顯, 選舉後的反泰米爾暴力事件在 選後持續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這樣針對泰米爾族群的暴力

在1982年公投前一年達到了高 峰,1982年以三分之二多數投 票通過的公投使聯合民族黨可 以在沒有選舉的情況下繼續執 政。反對此次公投的力量顯著且 遭到執政黨打壓,執政黨動員了 賈斯卡·塞瓦卡·桑加瑪雅(ISS) 工會的大批成員。 執政黨創立 ISS本身是為了破壞工會運動中 左派的支持基礎,其意識形態根 本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國族主義。 Tambiah (1986)和 Stanlev Gananath Obeyesekere (1984) 記錄了UNP對司法部門在內的 所有反對者的威脅和恐嚇,並以 此作為1983年暴力事件的背景。

>人類學家對於這些暴力的分析

1983年也使得斯里蘭卡國內的書寫文化產生些微改變。Jani De Silva記錄了1983年之後的知識生產,例如《斯里蘭卡的種族與社會變革》(1984年)和《斯里蘭卡的種族面向》(1987年)這一些重要著作。前者試圖打破僧伽羅人是優等的民族神話,而後者則批評了僧伽羅人和泰米爾民族主義,以及支持兩者的結構。社會科學批判針對「暴動」的回應是希望能影響論述和政策。

人類學家似乎渴望找出更 堅實的文化解釋來說明暴力的 郭謨和血腥程度,而不滿足於停 留在以經濟和政治的可能性條 件層面來解釋。

學者們正尋找方法來解釋

這些曾有人類學家認為相對 和平的僧加羅暴徒的憤怒和 暴力。因此我們參考以下學者 的分析,Bruce Kapferer以 及Jonathan Spencer的分析 (儘管斯賓塞不同意卡普弗 的觀點)。他們試題提供一個 解釋框架來說明由UNP創造 出的暴力政治空間,成為僧珈 羅集體意識的元素。Kapferer 將暴力比喻為一種惡魔性的 東西,而這個暴力存在於僧伽 羅的意識中,這樣的暴力存有 類似於驅魔儀式中惡魔的存 有狀態。在一項複雜的分析 中,他分析發生暴力事件的 脈絡以及階級動員的對抗, 卡普弗勒將暴力本身比作驅 魔。Spencer則是認政治使僧 伽羅人擺脫了日常生活中繁 文縟節。斯賓塞進一步指出, 僧伽羅人的暴力攻擊是由於 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 (LTTE)在北部戰勝並佔領, 這樣的情況挑戰了他們熟知 的寺院紀錄Mahavamsa的故 事。Mahavamsa是有關僧伽 羅人的歷史以及建構了僧伽 羅人對於泰米爾人的關係,文 本中描述的是僧伽羅國王如 何擊退泰米爾入侵者。

Valentine Daniel認為 僧伽羅和泰米爾對於過去歷 史的理解方式有助於理解暴 力的兇惡。丹尼爾主張這想群 人對於過去歷史的不同的立 場和觀點成被暴力產生的結 構性條件。這些不同的觀點一 個是認識論的層面,一個是存有論的層面。丹尼爾做出有說服力的結論,及是在存有和認識的層面上拒絕認同他者的存有狀態,面對他者而導致的自我身分的焦慮和根本的懷疑導致暴力產生。

> 研究對抗仇恨形成的政治

Daniel和Kapferer都因為他們文化主義者的本質化分析框架而遭受批判。許多人呼籲對肇事者是誰以及其組織方式進行更好的分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關於1983年暴力的思考和寫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種理解斯里蘭卡當時的政治的方式,而這種思考方式本質上受到當時泰米爾民族主義和

僧伽羅民族主義的對抗的影響。這種分析排除了對結構特徵的理解,而正是這種結構特徵維繫了對抗的持續。

1983年暴力事件有關的知識 生產,以從這些仇恨滋長的過 程學到一課。

> 來信寄至: Farzana Haniffa <<u>ffhaniffa@gmail.com</u>>

> 微微之界: 斯里蘭卡的社會學 與人類學

Premakumara de Silva,斯里蘭卡可倫坡大學,ISA宗教社會學委員會研究員

外國和當地社 會學家過去 針對斯里蘭卡 社會與文化 的大量關注,可以發現在斯 里蘭卡,社會學與人類學的 研究具有深厚的傳統。此傳 統較為顯著的貢獻,可以在 過往這些助益良多的書目調 查中發現,其研究對象包含 Goonetileke Ian (1979)Liz Nissan (1987)Bruce Kapferer (1990) (1997)`Michael Roberts Tudor Silva (1990, 2000) Susantha Goonatilake (2001) · Sasanka (2005,2014) Perera \Siri Hettige (2010)、Siri Gamage (2014) 等人 的著作。在這篇文章中,我將聚 焦於斯里蘭卡人類學和社會學 的內在聯繫,並回顧特定地區 中人類學和社會學者的既有研 究。

> 難捨難分的人類學/社會學

自人類學和社會學首次 在斯里蘭卡大學以學科的角

色亮相,已經過了60年。如今, 社會學無非是最受大學生歡 迎的學科之一。斯里蘭卡社會 學的一大特點,是其與人類學 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劃分。不管 是國內還是國外求學、受到人 類學與社會學傳統薰陶的學 者,許多都會到斯里蘭卡的大 學社會學系所工作。我本身和 許多其他斯里蘭卡的社會學者 一樣,就是同時受過這兩種訓 練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特點, 是斯里蘭卡社會學/人類學 家中,有很大比例的人是以斯 里蘭卡自身的議題為焦點,以 國外為研究對象的比例則較 少;其中當然也有些例外,像是 S.I. Tambiah 對泰國的佛 教研究、研究幾內亞和斐 濟植物園工人的 Chandra Javawardena,或是以尼泊 爾的親屬關系為研究主題的 Arjun Gunaratne 等等。從學 科內容而言,人類學和社會學 是難以分開的,幾乎所有斯里 蘭卡的大學社會學系所,都在 大學生與研究生的課程中融入 了這兩種學科的訓練,無視了 人類學與社會學之間的界線。 學生最終獲取的學位是「社會

學」的。即便現況是如此,許多 人也指出斯里蘭卡國內所教授 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和國 際上對於這兩個學科的理解, 可能有著不同的標準。

> 歷史回顧

從歷史上來看,斯里蘭 卡對於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興 趣,在兩個階段開始蓬勃發 展——人類學是在殖民時期, 社會學則是在後殖民時期。相 較於人類學和殖民統治之間的 連結,社會學最初則是在美國 的學術干預下於斯里蘭卡發 揚,這和Bryce Ryan在1950 年代被任命為錫蘭大學的第 一位社會學教授,也有很大的 關係。錫蘭大學的人類學研究 起源,則可以回溯到英國的殖 民時期, Seligman 在1911年 針對Vadda部落的原住民撰 寫的民族誌研究。在一戰和二 戰之間的時期,斯里蘭卡的人 類學研究是落後的。在斯里蘭 卡於1949年獨立後,社會學 便作為一個學科被引進,更在 1959年時設立了首個完整的 學位。1950年代中期,斯里蘭

卡與國外的學者,產出了許多 在民族誌/社會學上有重大價 值的文本;而這樣的傳統,後續 也由許多學者的社 會學/人類學工作 承續,例如 Bryce Ryan (1953) Peiris Ralph (1956)`Edmond Leach (1960, 1961) **Gananath** Obevesekere (1966) \ Nur Yalman (1967) `Kitsiri Malalgoda (1976)`H.L. Seneviratne (1978)`Bruce Kapferer (1983) 等 等。在斯里蘭卡獨立後,大部分 的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並沒 有直接處理斯里蘭卡「民族國 家」的新興議題,反而是專注於 種姓制度、親屬關係、土地所有 權以及主流宗教等。

針對斯里蘭卡進行調查的「 外國」人類學家,多數來自與 國人類學家對斯里蘭 外國人類學家對斯里蘭卡 的政治、文化與社會研究 有許多重要的貢獻;然而他 們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知名 的本土社會學/人類學家: Gananath Obeyesekere 以及 S.J. Tambiah 所影響,這兩位學者都是在頂尖北美露兩位學術生涯中開始展會與所述,很大一部份就是建立在領域,很大一部份就是建立後達上。後期里蘭卡籍研究者所進行的研究,對於我們理解過去、對於我們理解過去、對於我們理解過去、文化問題,也提供了很大幫助。

> 研究轉向

1980年代起,斯里蘭卡社會學/人類學的核心關懷,逐漸向社會中的群體暴力轉移,開始關注民族宗教的社群,或是像邊緣青少年這類弱勢群體等社會內部(intra-societal)的暴力。後獨立世代的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如Newton Gunasinghe、Siri Hettige 及Tudor Silva 等,都對此領域類有貢獻;這幾位學者都是在國外完成博士研究,並在回國後嘗試開創新的研究領域,例如斯里蘭卡鄉村地區的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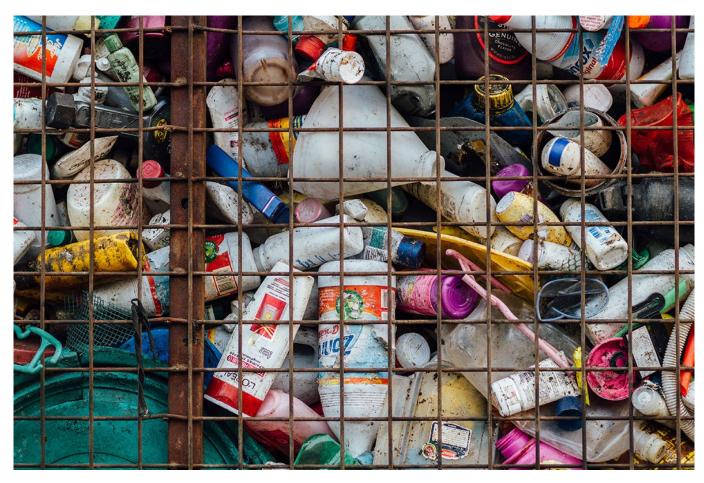
現象、青少年身份認同與暴力、 公共衛生等。不可忽視的是,社 會學/人類學學者近年來的工 作,在理論與方法論上,受歷史 悠久的人類學和社會學傳統影 響甚深。

在這篇短文中,我嘗試回 顧1949年第一個社會學系成 立至今,人類學和社會學作為 一個學科/研究/教學領域在 斯里蘭卡大學中的發展。現在 的大學中,15間裡面有11間設 有至少大學的人類學/社會學 科學位。人類學與社會學傳統 並存於教學課程、研究與出版 品的現象,也以不同程度呈現 在大學的系統上。必須注意的 是,教學、研究和出版品的品 質,以及人類學和社會學傳統 之間的連結程度,在不同學術 機構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在複雜 且動態的在地/全球環境中設 定一套共用的教學/研究/傳 播標準,將會是斯里蘭卡的學 術工作者所要面對的挑戰。

> 來信寄至: Premakumara de Silva <prema@soc.cmb.ac.lk>

> 全球化與依賴性: 中國塑膠廢棄物議題

Pinar Temocin, 廣島大學, 日本



菲律賓的塑膠廢棄物。

來源:Adam Cohn/flickr.com. 保留部分權利。

球化能夠視為是在社會、文化與經濟領域有著許多變遷的整體過程。不管從微觀還是宏觀的角度來說,全球化都影響了已開發/開發中的國家與區域。全球化透過挑戰我們的生活帶來重大變化。此外,由於新型態的經濟治理,環境也受影響。

對於全球化下現實世界的關注,使我們能夠看見支配的內在本質。全球化進程(或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發展出的依賴理論,闡明了國際系統是立基於經濟上核心國家(已開發國家)與貧窮的邊緣國家(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協調。在生態

週期中,我們看見依賴關係與資源開發間存在關聯。而這也產生一種非線性關係,其中,開發中國家似乎在廢棄物貿易中依賴已開發國家。我們可以將這些現象,視為全球化帶來的結果之一。

全球化透過加強經濟連結,協助全球南方與 北方國家建立更緊密的聯繫。但在考量雙重軌跡 的同時,這種關係變得比過往更加複雜。由此概 念延伸,仔細探討廢棄物處理的分層等級(尤其 是中國貧窮循環下的塑膠廢棄物問題)將會是個 理想的案例,來說明這種不平衡的關係是如何在 現實生活中發揮作用。

> 中國塑膠廢棄物議題

中國塑膠廢棄物貿易(有些人認為是場危機)是新世界體系中依賴性如何運作的最佳例證之一。中國是全球廢棄物工業中塑膠廢棄物(作為可回收廢棄物的主要目的地)的最大進口國與處理國,佔全球市場的56%。

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可能會產生令人擔憂的 結構影響。廢棄物出口國通過廉價的替代品,以 及採取以眼不見為淨的方式處理廢棄物而非致 力於回收,來消除廢棄物成癮的後果。更不用說, 這些出口國既可以從這樣的廢棄物處理的分工 體系受益,也能享有更好的環境條件。廢棄物進 口國(如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與印度尼西亞等) 則承受了對人民健康狀況的危害、勞動剝削與環 境污染等。更糟糕的是,廢棄物進口國在經濟利 益的考量下, 並無法建立有效的規範或控制機制 來限制廢棄物的進口。雖然廢棄物貿易可視為開 發中發展經濟的大好機會,但經濟機會與有毒的 現狀是存在衝突的。中國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 成為這種衝突中的白老鼠,在逐漸積累的毒物中 影響了自身的環境與人口的健康,也因而侵犯了 國民在健康、乾淨與安全的環境中生活的權利。此外,這衝突也影響了工人的權利,因他們必須 在相當惡劣的工作狀況下,負責處理國外進口的 塑膠廢棄物。

透過廢棄物的出口,已開發國家與工業國家(如美國、日本與澳洲等)的人民能夠享受更乾淨、更受保護的環境與更健康的生活模式,而正與塑膠汙染奮鬥的中國工人、以及那些在塑膠回收部門工作而沒有上學的兒童,都因為是塑膠廢棄物產業的一份子而正在受苦中。因為已開發國家並沒有致力於發展國內的回收工業和政策,選擇眼不見為淨的處理方式將廢棄物處理到開發中國家,這最終導致了一個現象——貧窮國家在工業國家的自利與廢棄物出口下,面臨了社會環境的危機。

>結論

儘管過去幾年來中國的經濟成長似乎掩蓋了塑膠廢棄物回收的問題,但這仍然是一個全球化或全球不平等的重要議題,反映了長期以來廢棄分類與回收管理的全球霸權。有著不平等效應的全球廢棄物貿易,事實上並沒有對廢棄物進口國家)面臨了回收戰爭與塑膠困境。此外,全球廢棄物貿易亦反映了全球北方對開發中國家的控制,阻礙了全球南方在自身的發展上朝向更公平的世界秩序邁進。■

來信寄至:

Pinar Temocin <<u>pnrtemocin@hotmail.com</u>>